

# 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及其关系

王飞峰

三燕考古学和高句丽考古学长期以来都是东北亚地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及其关系研究也是其重要课题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三燕与高句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直接接壤，而且两者的莲花纹瓦当还显示出密切的关系。目前关于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特别是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时间各国学者观点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此笔者就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及其关系浅谈几点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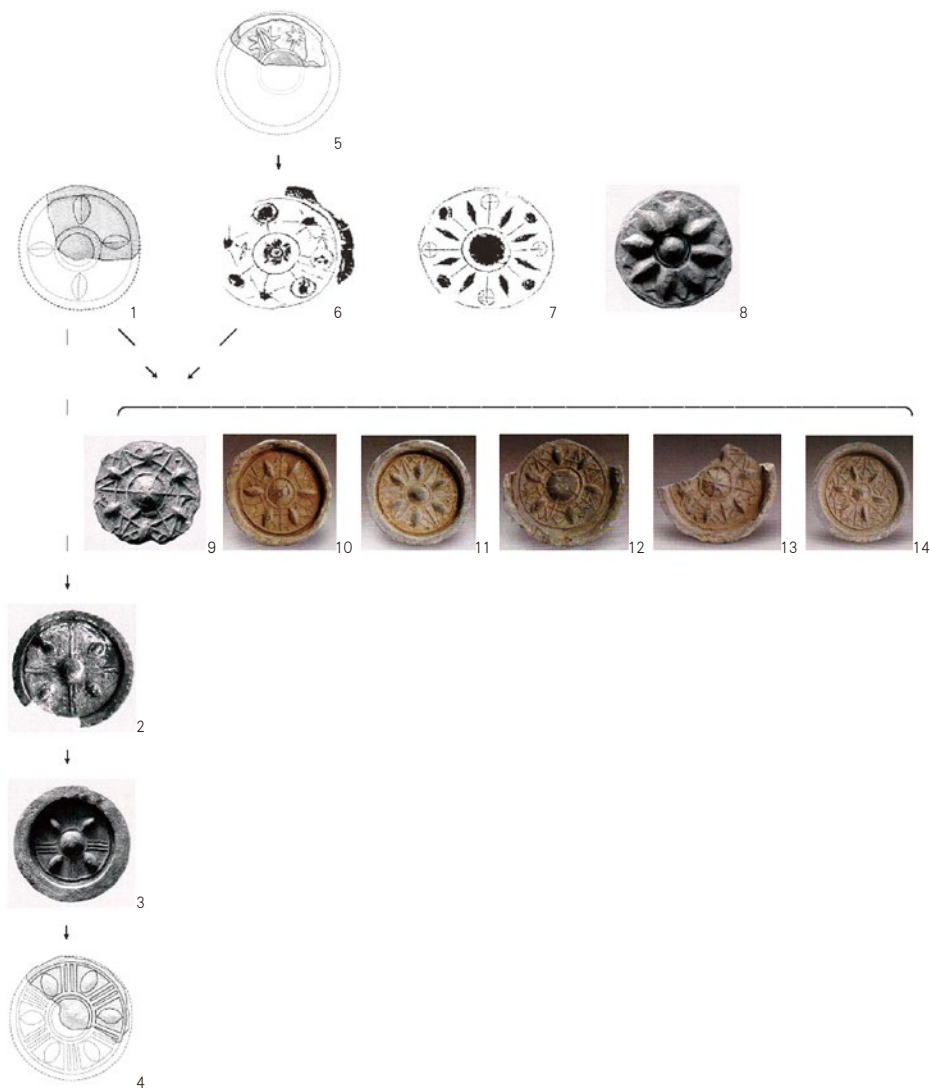
## 1. 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出现

佛教自东汉末年由西域传入中土，三国西晋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东晋十六国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佛教进入东北地区的准确年代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最晚在前燕初期佛教已经在东北地区有了一定的发展。永和元年(345)，前燕慕容皝在龙城附近的龙山建立龙翔佛寺<sup>[1]</sup>，这是目前已知东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也是佛教在前燕境内得到统治阶层认可的重要标志。作为佛教重要装饰纹样之一的莲花纹，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与中国古典建筑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与莲花纹相关的纹样和建筑构件等，莲花纹瓦当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资料，可以确认莲花纹瓦当早在战国时代的建筑中已经使用；南北朝及其以后流行的莲花纹瓦当在莲花特点、当面莲花布局、当心变化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秦汉瓦当的影响<sup>[2]</sup>。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莲花纹瓦当早在战国秦瓦当中就已出现，但系用写实的手法对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莲花进行艺术刻画，与南北朝时期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莲花纹瓦当，不仅形制、渊源不同，更重要的是赋予其中的意识观念，存在着天地之别<sup>[3]</sup>。十六国开始，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莲花纹瓦当应当是受到佛教影响而出现的。三燕莲花纹瓦当同样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的，在讨论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出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三燕莲花纹瓦当的认定和编年进行必要的说明。

三燕都城所在的龙城、薊城、邺城和中山在三燕以后经历多次城市建设，三燕遗迹尤其是宫殿遗址确认难度较大，与三燕宫殿等建筑遗迹相关的考古工作不多，加之十六国时期能够对比的瓦当材料较少等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三燕瓦当的认定及编年相对困难。我们认为三燕瓦当的认定应从龙城、薊城、邺城和中山四地及其附近地区着手，从已经发掘和出土的与三燕相关的遗物中寻找。三燕都城龙城及其周围的朝阳北大街<sup>[4]</sup>、朝阳北塔<sup>[5]</sup>及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sup>[6]</sup>等出土了一批与三燕相关的瓦当材料。薊城(350—357年)和中山(385—397年)

作为前燕、后燕都城的时间不长，目前还没有发现与前燕、后燕有关的瓦当材料。邺城遗址已经发表的瓦当材料中有与朝阳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出土瓦当相似的材料<sup>[7]</sup>，我们认为应是三燕时期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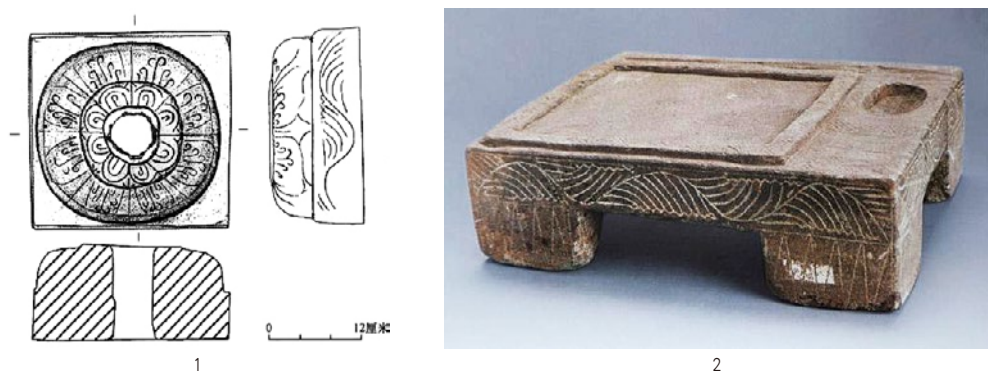
关于三燕莲花纹瓦当的类型及年代，笔者在《三燕瓦当研究》中曾有梳理，在此我们以《三燕瓦当研究》为基础对三燕莲花纹瓦当的类型、演变和年代做简单阐述。目前我们可以知道A型I式(图一，1)和Ba型莲花纹瓦当(图一，5)在龙城遗址中均有发现，根据其形制判断可能是前燕龙城时期(341—350年)的遗物。A型II式(图一，2)和Bb型莲花纹瓦当(图一，9-14)在龙城遗址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等均有发现，其时代可能为后燕中山时期(385—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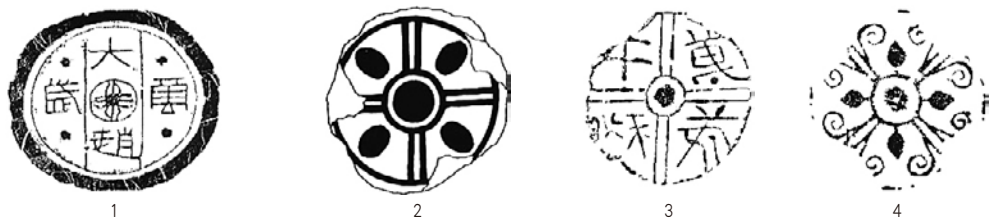
图一 三燕莲花纹瓦当发展演变图

年)。A型Ⅲ式(图一, 3)和A型Ⅳ式瓦当(图一, 4)在龙城遗址和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等均有发现, 其时代可能分别为后燕慕容熙时期(401—407年)、北燕时期(407—436年)。几何纹瓦当(图一, 6)和C型莲花纹瓦当(图一, 7)均为邺城遗址发现, 其时代可能是前燕邺城时期(357—370年)。D型莲花纹瓦当(图一, 8)仅在龙城遗址发现, 其时代可能在前燕迁都邺城(357年)之前。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在三燕瓦当的断代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遗址性质和年代的认定还存在一些差异。金岭寺发掘简报认为该建筑群应是前燕及前燕以前不久慕容部开始定居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一处早期高等级建筑遗存<sup>[8]</sup>。笔者认为该遗址是与后燕时期慕容垂“缮宗庙社稷”有关的考古遗存, 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可能为后燕中山时期、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应为慕容熙时期遗物<sup>[9]</sup>。田立坤先生认为此处建筑可能为前燕慕容皝时期修建的“慕容廆庙”, 但是对金岭寺建筑遗址出土的两类瓦当的时代并未作出说明<sup>[10]</sup>。由于后燕建国时的首都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并没有发现三燕时期的瓦当或遗物, 因此金岭寺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后定州市出土的后燕瓦当。即如果定州出土的瓦当与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相似, 那么金岭寺建筑遗址的最初修建年代为后燕慕容垂时期, 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应为后燕慕容垂时期, 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为后燕慕容熙时期; 反之, 如果定州出土瓦当与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相似, 那么金岭寺建筑最初修建年代为前燕慕容皝时期, 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应为前燕时期, 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可能为后燕慕容垂时期。此外, 我们认为金岭寺建筑遗址发现的某些遗物表明该建筑群可能一直使用到北燕时期, 遗址曾出土一件浅灰色细砂岩质础石(图二, 1), 础石顶上饰八瓣莲花纹, 侧边阴刻水波纹, 其中水波纹不但与冯素弗墓出土的石砚(图二, 2)侧面纹饰较为相似<sup>[11]</sup>, 而且两者的质地均为细砂岩, 雕刻技法也大体一致。



图二 金岭寺遗址出土础石与冯素弗墓出土石砚  
1. 金岭寺遗址出土础石 2. 冯素弗墓出土石砚



图三 邺城遗址及抚顺地区出土瓦当

1. 邺城遗址“大趙萬歲”瓦当 2. 永陵南城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 3. 抚顺出土“千秋萬歲”瓦当 4. 抚顺出土卷云纹瓦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前燕时期已经出现莲花纹瓦当，莲花纹瓦当中既有网络状底纹的莲花纹瓦当，也有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和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特别是后者成为以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主要类型。A型I式和Ba型莲花纹瓦当的莲瓣中间有小短线，与此类似的莲瓣在后赵时期的“大趙萬歲”瓦当<sup>[12]</sup>（图三，1）上同样可以找到，因此三燕莲花纹瓦当中早期的莲花纹瓦当可能受到了后赵时期此类纹样影响。后赵时期佛教盛行，后赵地区出现的与莲花纹有关的瓦当无疑是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加之后赵曾与前燕直接接壤、交往密切，因此我们推测这一时期佛教可能由后赵传入前燕，并在前燕地区开始传播，到345年慕容皝建立龙翔佛寺时佛教在前燕境内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东北地区与三燕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类似的还有新宾县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sup>[13]</sup>（图三，2），日帝时代在修建抚顺市永安公园时曾出土了汉代的“千秋萬歲”瓦当（图三，3）和卷云纹瓦当<sup>[14]</sup>（图三，4），其中部分卷云纹瓦当的当面还饰有四个花叶纹，与此卷云纹瓦当相似的半瓦当在20世纪80年代永陵南城调查中也有发现<sup>[15]</sup>，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陵南城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千秋萬歲”瓦当和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原报告称为图案瓦当并且认为是魏晋时期的莲花纹瓦当<sup>[16]</sup>）。因此我们认为新宾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应是当地文字瓦当——“千秋萬歲”瓦当与饰有花叶纹的卷云纹瓦当结合后的产物，可能并非我们认为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传统意义上的莲花纹瓦当，至于其时代上限应晚于上述汉代的“千秋萬歲”瓦当和卷云纹瓦当。永陵南城出土的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制作规整、火候较高，与三燕瓦当相比有着明显区别，此类瓦当不但不属于三燕瓦当，而且还应是在慕容鲜卑占领这一地区之前制作完成的，因此其年代下限应不晚于慕容鲜卑占领辽东之时，即东晋太兴二年（319）<sup>[17]</sup>。所以三燕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应受到了永陵南城双界格线四叶纹瓦当的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三燕莲花纹瓦当出现于前燕迁都龙城之际（341年）或稍晚，不但是佛教传入前燕地区的直接产物，而且与慕容皝迁都龙城，兴建新都等活动有关。如咸康七年（341），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前曾安排阳裕、唐柱等修建龙城宫殿和宗庙等<sup>[18]</sup>。迁都龙城之后，除了巡视郡县，发展农业之外，慕容皝还增修了龙城宫阙<sup>[19]</sup>。

## 2. 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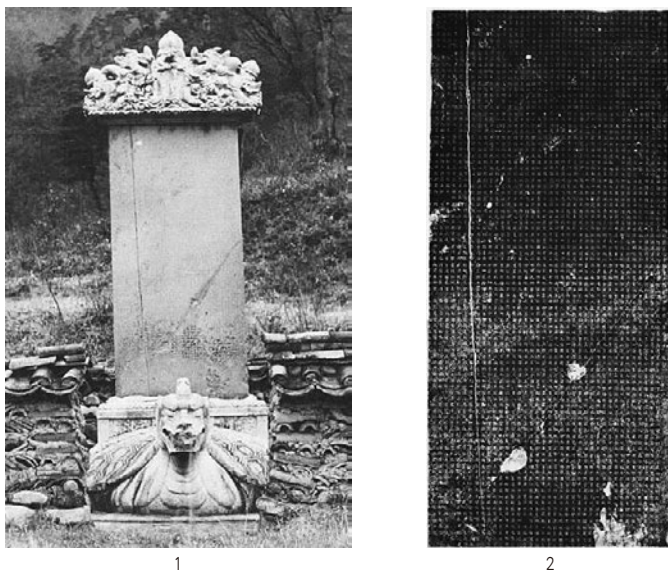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认为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主要条件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佛教传入高句丽；二是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其中三燕莲花纹瓦当对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影响，下文将专门论述。此处重点讨论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及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等。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目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认为372年佛教由前秦僧人顺道传入高句丽<sup>[20]</sup>。二是根据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认为不晚于357年的4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sup>[21]</sup>，甚至认为冬寿本人可能也是佛教信徒<sup>[22]</sup>。三是根据《高僧传》中支道林(314—366年)与“高丽道人书”的记载，认为“高丽道人”即是当时高句丽地区的佛教徒，因此在366年之前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sup>[23]</sup>。四，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等关于昙始的记载认为东晋太元二十年(太元为东晋孝武帝年号，376—396年，太元二十年即395年)佛教由东晋僧人昙始传入高句丽<sup>[24]</sup>。五，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等关于昙始的记载、朝鲜半岛及高句丽地区发现佛像资料等认为佛教在东晋太元末期(约390—396年)由后秦僧人昙始传入高句丽<sup>[25]</sup>。其中第一种观点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以上各种观点基本上是以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实质性的考古证据并不多，因此我们首先将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

目前可以见到最早关于高句丽佛教传入的记录见于南朝梁代僧人慧皎(497—554年)撰写的《高僧传》，《高僧传·卷十·昙始传》：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丽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sup>[26]</sup>。自慧皎撰《高僧传》以后，直到元代中国历代文献有关昙始的记录如《法苑珠林》<sup>[27]</sup>《北山录》<sup>[28]</sup>以及元代的《神僧传》<sup>[29]</sup>等均是以前《高僧传》为基础，或是直接援引，或是稍加归纳，并无多大出入。

朝鲜半岛最早记录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文献当属统一新罗末期由著名学者崔致远(857—?年)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全称《大唐新罗国故凤岩山寺教谥智证大师寄照之塔碑铭并序》)。《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sup>[30]</sup>(图四，1、2)位于今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加恩邑院北里凤岩寺，为韩国宝物第138号，碑高2.73、宽1.64、厚0.23米，螭首龟趺，碑阴末有“龙德四年岁次甲申六月口口日竟建”的题记，龙德为五代时期后梁年号，龙德四年即924年<sup>[31]</sup>，该碑开始部分叙述了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

第3列末段：昔当东表鼎峙之秋，有百济苏涂之仪，若甘泉金人之祀，厥后西晋昙始始之貌，如，第4列上段：摄腾东入，句骊阿度度于我，如康会南行。崔致远虽然误将昙始所处的时代说成西晋，但是却记录了昙始入高句丽传法的事实。碑文中“昙始始之貌，如摄腾



图四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照片及正面碑文拓片  
1.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 2. 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正面碑文拓片

东入”，即是说昙始到达高句丽，如同东汉明帝时到达洛阳的西域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一样，使得佛教开始在高句丽地区传播。唐代高句丽人也自称高句丽为貊，这一点可以从高句丽灭亡后居住在唐朝的泉男生之子泉献诚的墓志(大足元年，701年)中得到证明：君讳献诚，其先高句骊国人也……公即襄公嫡子也。生于小貊之乡，早有大成之用，地荣门宠，一国罕俦<sup>[32]</sup>。

唐代道宣(596—667年)所撰《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六·释僧意传》有：释僧意……元魏中，住泰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于暮齿，精诚不倦。寺有高骊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如此七像并是金铜，俱陈寺堂，堂门常开，而鸟兽无敢入者，至今犹尔<sup>[33]</sup>。部分学者认为此处所述高骊像即高句丽佛像，此佛像为前秦时期(351—394年)高句丽赠送给竺僧朗的<sup>[34]</sup>。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述高骊像、相国像均为高句丽佛像，其中相国像可能是好太王时期(391—412年)高句丽“相国”赠送给竺僧朗的<sup>[35]</sup>。从目前高句丽地区的佛像资料来看，中国、朝鲜和韩国境内均有发现。中国学者1985年在国内城发现了一尊金铜佛像<sup>[36]</sup>(图五，1)。朝鲜发现的佛像资料较多，部分为1945年以前日本学者发掘高句丽佛寺(如平壤清岩里土城内的清岩里废寺<sup>[37]</sup>、平安南道平原郡德山面元五里废寺<sup>[38]</sup>等)的出土品或采集品，韩国发现的高句丽佛像<sup>[39]</sup>(图五，2)多为采集品。朝鲜半岛发现的佛像除首尔市纛岛发现的一尊金铜佛像<sup>[40]</sup>(图五，3)时代较早外，高句丽地区佛像资料的时代大体不早于5世纪初。虽然也有学者认为纛岛金铜佛像属于高句丽佛像，可能是5世纪初制造于中国北方地区<sup>[41]</sup>，韩国学者金元龙先生也认为纛岛佛像来自中国的可能性很高<sup>[42]</sup>，但佛像出土地周围均为百济墓葬和遗址，没有发现与高句丽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因此这件佛像



图五 国内城及朝鲜半岛发现金铜佛像

1. 国内城发现高句丽金铜佛像 2. 庆尚南道宜宁郡出土高句丽金铜佛像（延嘉七年，539年） 3. 首尔市蘓岛发现金铜佛像

可能不属于高句丽佛像。

因此参考包括慧皎《高僧传》在内的中国史料、崔致远撰写的《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及高句丽地区发现的佛像资料等我们认为高句丽佛教是在东晋太元末年(约390—396年)由后秦关中僧人昙始传入的，昙始当时可能是从关中出发由陆路到达辽西，经辽东进入高句丽。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言，高句丽最早的瓦当为卷云纹瓦当，卷云纹瓦当消失之后出现了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等。出土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主要有生活遗址和墓葬两大类，其中生活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的颜色多为红褐色，当面基本没有界格线；墓葬上出土的莲花纹瓦当颜色基本为灰褐色，当面多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颜色的区别、界格线的有无与遗迹性质密切相关的特征在国内城时期的莲花纹瓦当产生之后较为显著，迁都平壤之后这些特征不再明显。

2004年出版的《丸都山城》<sup>[43]</sup>报告认为丸都山城宫殿址毁于342年前燕慕容皝攻破丸都山城的战火，说明发掘者认为最晚到342年高句丽已经出现了莲花纹、忍冬纹和兽面纹瓦当。日本学者田村晃<sup>[44]</sup>、东潮<sup>[45]</sup>等，韩国学者金希灿<sup>[46]</sup>、白种伍<sup>[47]</sup>等认为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应是受到冬寿墓莲花纹的影响而产生的，最早的莲花纹瓦当是太王陵发现的莲瓣上有“Y”字形(即莲蕾形莲瓣，笔者注)的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时代大体在4世纪中晚期。也有学者认为在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的瓦当出现时代较早，产生于4世纪后半期，无界格线莲花纹瓦当的年代上限为6世纪初前半<sup>[48]</sup>。目前中国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遗

迹中均发现过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其中集安和平壤地区发现的莲花纹瓦当不但数量很多，而且形制复杂。国内城时期集安地区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墓葬主要有千秋墓、太王陵、将军坟<sup>[49]</sup>、禹山M2112<sup>[50]</sup>和长川二号墓<sup>[51]</sup>、上活龙5号墓<sup>[52]</sup>等，出土莲花纹瓦当的遗址有国内城<sup>[53]</sup>、丸都山城<sup>[54]</sup>、东台子遗址和梨树园子南遗址<sup>[55]</sup>等。其他遗址和墓葬包括吉林省辽源市龙首山山城<sup>[56]</sup>、延边温特赫部城<sup>[57]</sup>、辽宁省抚顺市高尔山城及附近的施家墓地<sup>[58]</sup>、新宾县五龙山城<sup>[59]</sup>、西丰县城子山山城<sup>[60]</sup>、辽阳市金银库遗址<sup>[61]</sup>和燕州城<sup>[62]</sup>、丹东市璦河尖古城<sup>[63]</sup>、凤城市凤凰山山城<sup>[64]</sup>、岫岩县娘娘山山城<sup>[65]</sup>、大连市大黑山山城<sup>[66]</sup>、盖州市青石岭山城<sup>[67]</sup>等。朝鲜境内发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多分布在平壤地区，主要有平壤城、大城山城<sup>[68]</sup>、长寿山城<sup>[69]</sup>、定陵寺<sup>[70]</sup>等，韩国境内发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遗址有首尔市红莲峰1号堡垒<sup>[71]</sup>、峨嵋山城<sup>[72]</sup>和京畿道涟川市的瓠芦古垒<sup>[73]</sup>等。

就目前发现的莲花纹瓦当的形态和制作工艺等来看，集安地区的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其时代整体上应早于其他地区高句丽遗迹中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因此我们认为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应该从集安地区的高等级遗迹如丸都山城宫殿址、东台子遗址、千秋墓等出土品中予以考虑。

丸都山城宫殿址，虽然报告认为其下限为342年，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发掘的宫殿区可能是慕容皝攻破丸都山城之后好太王十七年(407)重新选择基址“增修宫阙”(《三国史记·卷第十八·广开土王本纪》：十七年春二月，增修宫阙)的结果，那么寻找丸都山城早期宫殿址及慕容皝烧毁的宫殿址也成为国内城时期高句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sup>[74]</sup>。丸都山城瞭望台、各个门址发现的瓦当与宫殿址出土瓦当在颜色、胎体和纹样上也基本一致，那么这些瓦当中部分遗物应该是好太王时期的产物，整体上来看丸都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纹瓦当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407)，下限为迁都平壤之时(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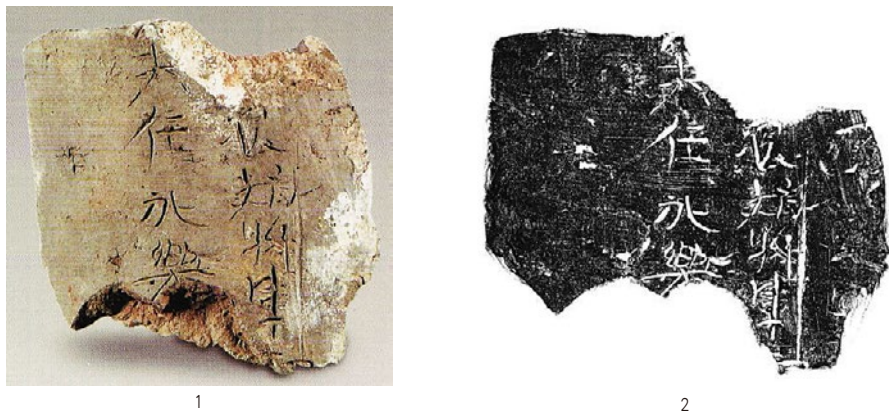
东台子遗址为早年日本学者发现，关野贞较早对其进行了报道<sup>[75]</sup>，解放前部分遗址已被破坏。1958年吉林省博物馆对东台子遗址进行了发掘<sup>[76]</sup>，认为是高句丽时期一处重要的建筑遗址。1982年方起东先生<sup>[77]</sup>通过对东台子遗址规模和格局等的研究认为其是故国壤王九年(392)三月修建的国社和宗庙遗迹。2010年韩国学者姜贤淑<sup>[78]</sup>通过对东台子遗址出土遗物等的研究，认为东台子遗址的时代在5世纪末以后、渤海灭亡之前。笔者在对东台子遗址出土遗物、相关遗迹和文献等系统梳理后认为东台子遗址是故国壤王八年(391)<sup>[79]</sup>三月下令修建的国社和宗庙，但是当年五月故国壤王就已去世，可能由于当时的建筑并未最终完成，也就没有使用瓦当，如果故国壤王时期修建的国社和宗庙使用瓦当，我们认为应是千秋墓上发现的卷云纹瓦当类似的瓦当<sup>[80]</sup>。那么东台子遗址出土的大量莲花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和兽面瓦当并非故国壤王时期的遗物，应是好太王时期在修缮时使用的瓦当，部分瓦当与丸都山城宫殿址发现的瓦当纹样相同或类似，甚至两个遗址之间还存在着同范瓦当，所以说东台子遗址部分莲花纹瓦当的年代应与丸都山城的同类出土品一致<sup>[81]</sup>。



2003年在千秋墓出土一件刻有“永乐”铭文的筒瓦<sup>[82]</sup>（图六，1、2），泥质灰陶，残长13、宽15.5、厚1.5厘米。筒瓦凸面残留两列铭文，共计8个字，《集安高句丽王陵》报告给出了释文，右列：（乐）浪赵将军，左列：口未在永乐。但是也有学者释为：（乐）浪赵将军，口夫任永乐<sup>[83]</sup>。从筒瓦上所留的字形和文义来看，报告给出的释文较为可信，而且报告还认为这是好太王时期为千秋墓修陵所用的瓦件，并根据好太王在位年代（391—412年）推测左列的铭文为：（乙或丁）未在永乐。我们通过对高句丽的葬俗及筒瓦上“未”字上一字残存字形等的研究认为其铭文为“（乐）浪赵将军”、“（丁）未在永乐”<sup>[84]</sup>。好太王碑第四面第7—9列有“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一烟户差错，惟国罍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又制：守墓人自今以后，不得更相转卖，虽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买，其有违令，卖者，刑之。买人，制令守墓之”。说明好太王时期不但制定了一系列与守墓制度有关的律令，而且还曾经在“祖先王墓”上立碑，在立碑的同时对部分陵墓进行修缮也在情理之中。千秋墓出土的瓦当中既有高句丽卷云纹最晚阶段的无铭文卷云纹瓦当，又有莲花纹瓦当，千秋墓发现的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与太王陵、将军坟的同类瓦当相比较，表现出较早的特点<sup>[85]</sup>。因此在集安地区的王陵中千秋墓是高句丽卷云纹瓦当消失、莲花纹瓦当出现的具有分界线性质的陵墓，由于在千秋墓上发现了可能为“丁未”的铭文筒瓦，所以我们认为好太王在丁未年（407）修缮了父亲故

国壤王的陵墓，使用了双界格线六瓣莲花纹瓦当，那么这些瓦当的年代也应该不晚于407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集安地区当时高句丽的王宫遗址（丸都山城宫殿址）、国社和宗庙遗址（东台子遗址）和王陵（千秋墓）这些高等级遗迹上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出现时间应不晚于好太王时期的丁未年（407）。集安地区的其他遗址和墓葬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其出现时间也不会早于上述三个遗迹的莲花纹瓦当的年代。因此我们认为高句丽最早的莲花纹瓦当首先出



图六 千秋墓发现“永樂”铭文筒瓦照片及拓片



图七 大黑山山城出土瓦当、当沟与集安地区发现瓦当、当沟

1. 大黑山山城发现莲花纹瓦当 2. 东台子遗址出土莲花纹瓦当  
3. 大黑山山城发现当沟 4. 丸都山城宫殿址发现当沟 5. 将军坟西南建筑址出土当沟

现于集安地区，包括当时高句丽的国社和宗庙、宫殿和王陵等遗迹，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大元之末(约390—396年)后秦僧人昙始将佛教传入高句丽地区。佛教的传入对高句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莲花纹作为一种具有佛教含义的装饰纹样开始“爆炸式”的出现，一直使用到高句丽灭亡。

而大黑山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和斜方格纹当沟也可以为我们上述的推测提供佐证。大黑山山城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山顶，平面呈不规则形，周长约5000米，城内曾采集到“卑沙”“毕奢”等铭文陶片<sup>[86]</sup>。城内还发现有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和斜方格纹当沟，现收藏于旅顺博物馆，莲花纹瓦当(图七，1)<sup>[87]</sup>的纹样和莲瓣形态等与东台子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图七，2)<sup>[88]</sup>较为相似，斜方格纹当沟(图七，3)<sup>[89]</sup>与丸都山城宫殿址(图七，4)<sup>[90]</sup>、将军坟西南建筑址(图七，5)<sup>[91]</sup>发现的同类器物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瓦在高句丽时期是一种具有身份和等级象征的标志物，《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有：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和王宫、官府乃用瓦<sup>[92]</sup>。大黑山山城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和当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反映了好太王对高句丽占领辽东地区的一种宣示。高句丽最初占据辽东地区始于故国壤王二年(385)六月对辽东郡和玄菟郡的侵占，但是同年十一月就被后燕将领慕容农收复<sup>[93]</sup>。至400年时，后燕尚有势力大举进攻高句丽，曾拔高句丽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sup>[94]</sup>。402年，高句丽进攻宿军，导致后燕平州刺史慕容归逃走<sup>[95]</sup>。404年，高



1



2



3

图八 冬寿墓莲花纹及太王陵莲花纹瓦当

1. 冬寿墓墓主人坐帐 2. 冬寿墓坐帐上的莲蕾形莲瓣 3. 太王陵出土莲蕾形莲瓣的莲花纹瓦当

句丽攻燕<sup>[96]</sup>。金毓黻先生认为在这一年高句丽最终占领辽东，在《东北通史》中有：考高句骊于晋太元十年六月，初陷辽东、玄菟二郡，至是年十一月底，燕复二郡，是即高句骊故国壤王二年(385)也。又后十九年为晋元兴三年，而辽东再陷，玄菟郡亦同时沦陷，是即广开土王之十四年(404)，而终于不能复，直至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灭高句丽之日，辽东之故地始复，然已沦陷二百六十五年，可谓久矣<sup>[97]</sup>。大黑山山城莲花纹瓦当和当沟的出现同样也为金毓黻先生的说法提供了考古学证据，这些器物的年代应是在高句丽占领辽东之后不久，其上限则是晋元兴三年(好太王十四年，404)以后的一段时间，但是不应早于好太王时期

的丁未年(407)，下限则是高句丽迁都平壤之时(427)。

大黑山山城作为目前发现的辽东半岛最南端的一座高句丽山城，雄踞大黑山山巅，扼守大连湾地区，是高句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隋唐时期进攻高句丽，从山东半岛浮海而来的隋唐军队在这一地区首选的进攻地点就是大黑山山城<sup>[98]</sup>。好太王作为高句丽中期的一代国王，武功赫赫，功勋弥高，当然会意识到大黑山山城的重要性，一方面在城中使用瓦当和当沟这样的器物来表明山城的地位，一方面也不排除暗含着向先王、先祖乃至后燕彰显武功的含义。

冬寿墓中发现的莲花纹特别是冬寿坐帐两角出现的莲蕾形莲花<sup>[99]</sup>(图八，1、2)与太王陵上发现的莲蕾形莲花纹瓦当<sup>[100]</sup>(图八，3)的莲蕾形态比较接近，这也成为诸多学者认为太王陵发现的此类瓦当是高句丽最早莲花纹瓦当的重要依据。冬寿夫妇的坐像均位于帷帐之内，以帷帐作为随葬品的习俗，从战国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sup>[101]</sup>。墓主人坐于帐中的形象则流行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以莲花、龙头和流苏等装饰帐盛行于十六国北朝时期，《邺中记》有：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头衔五色流苏。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囊。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石窟也发现帐角用龙装饰的现象<sup>[102]</sup>。冬寿墓的坐帐，帐顶装饰莲花，帐角装饰莲花、璜和流苏，与辽阳上王家晋墓<sup>[103]</sup>发现的男主人坐帐十分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冬寿墓主人位于坐帐内的形象实际上是利用辽西地区魏晋壁画中的某些片段为粉本，同时还存在着根据墓主人身份等对粉本进行选择、组合和改造的情况，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并不代表当时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只是代表一种装饰和纹样，一个粉本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04]</sup>。

### 3. 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关系

关于三燕莲花纹瓦当和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关系，虽然各国学者都认为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对于影响与被影响的主体和客体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高句丽莲花纹瓦当是在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下产生的，以中国学者李新全<sup>[105]</sup>、王飞峰<sup>[106]</sup>等，日本学者桃崎祐辅<sup>[107]</sup>等为代表；二是三燕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受到了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影响，以韩国学者姜贤淑<sup>[108]</sup>等为代表。本文分析了三燕、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的时间和背景，我们发现从时间上来看，三燕莲花纹瓦当产生的时间明显早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出现时间，可能在北燕时期(407—436年)莲花纹瓦当被文字瓦当取代；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时间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407)，一直使用到高句丽灭亡；因此从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而言，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不会影响到三燕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而三燕莲花纹瓦当则会影响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从瓦当的系谱来看，三燕莲花纹瓦当中，既存在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也有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而且从这两类莲花纹瓦当的演变规律来看，花瓣数量和界格线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这些特征与国内城时期高句丽

莲花纹瓦当中有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无界格线的莲花纹瓦当发展演变的特点完全一致。从三燕和高句丽遗物的关系来看，高句丽墓葬壁画的纹样和布局、武器、马具和甲冑等诸多方面均受到三燕文化的强烈影响，某些器物如用于战争的铁镞、防护装备的甲冑、驾驭马具的衔镡和装饰用的步摇形云珠，高句丽遗物均受到三燕同类器物的影响，甚至达到了难分彼此的程度。从当时的人员交往情况来看，二者之间交往频繁，前燕时期高句丽曾臣服于前燕，而且从前燕时期开始，就有前燕人如冬寿、郭充等逃往高句丽。因此我们认为从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瓦当的系谱、三燕和高句丽交流等情况来看，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均受到了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

#### 4. 结语

三燕莲花纹瓦当作为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莲花纹瓦当，其产生于前燕迁都龙城(341年)后不久，在营造龙城的过程中大量被使用，北燕时期可能被文字瓦当(“富貴萬歲”)取代。高句丽莲花纹瓦当产生于国内城地区，首先在王陵和高等级遗迹中开始使用，其产生时间应不晚于好太王十七年(407)。值得注意的是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实际控制了辽东半岛以后，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黑山山城也出现了高句丽早期莲花纹瓦当和当沟，显示了大黑山山城的特殊意义。三燕莲花纹瓦当、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均是在佛教传入上述地区之后在佛教的直接影响下出现的，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了三燕莲花纹瓦当的影响，特别是三燕莲花纹瓦当中的无界格线莲花纹瓦当和有界格线莲花纹瓦当，成为以后高句丽莲花纹瓦当的重要类型。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度重大课题(16ZDA149)阶段性成果。

#### 注

- [1]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5—2826页：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此事即345年慕容皝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建立龙翔佛寺，史称“龙见立寺”。本文所用正史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不再赘述。
- [2] 刘庆柱：《关于中国古代莲花纹瓦当图案渊源考古研究》，《고대 동아시아의 기와》，한국기와학회，2008년。
- [3] 戈父(编著)：《古代瓦当》，第179页，中国书店，1997年。
- [4] 万雄飞、白宝玉：《朝阳老城北大街出土的3—6世纪莲花纹瓦当初探》，《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第61—66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5] 朝阳市北塔考古勘察队、朝阳市北塔维修办公室：《朝阳北塔1986—1989年考古勘察纪要》，《辽海文物学刊》，第15—23页，1990年第2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6] 辛岩、付兴胜：《金岭寺魏晋建筑群址为研究三燕文化提供重要线索》，《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

- 日第1版。辛岩、付兴胜、穆启文：《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198—224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所用金岭寺相关材料均出自该报告。
- [7] 焦智勤：《邺城瓦当分期研究》，《殷都学刊》，第43—54页，2007年2期。其中第52页图二十一、二十二莲花纹纹样和瓦当整体布局与金岭寺遗迹出土材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前燕都邺城时期的瓦当。
- [8] 辛岩、付兴胜、穆启文：《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
- [9] 王飞峰：《三燕瓦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0] 田立坤：《金岭寺建筑址为“鹿庙”说》，《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 [11] 本文图二：2引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燕文物精粹》，第122页，图166，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
- [12] 本文图三：1引自焦智勤：《邺城瓦当分期研究》，《殷都学刊》，第43—54(52)页，图二十九：1，2007年第2期。
- [13] 本文图三：2引自高桥匡四郎：《蘇子河流域に於ける高句麗と後女眞の遺跡》，《建国大学研究院研究期報》，第三一函，1941年第二号。
- [14] 本文图三：3、4引自渡邊三三、齋藤武一：《滿洲國撫順の古瓦に就て》，《考古學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一號，第667—690(670)，第二圖：2、6，1939年。
- [15] 徐家国：《辽宁新宾县永陵镇汉城址调查》，《考古》，第1049—1051页，1989年第11期。
- [16] 李新全、苏鹏力：《辽宁新宾永陵南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第187—18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7] 《晋书·卷六·元帝纪》，第151—155页：（大兴）二年（319）……八月，肃慎献柎矢石罽……十二月乙亥，大赦，诏百官各上封事，并省众役。鲜卑慕容廆袭辽东，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慙奔高句丽。三年……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玺三纽。……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知道大兴二年（319）慕容廆袭击辽东成功，导致当时的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慙逃亡高句丽，此时慕容鲜卑已经实际控制了包括今永陵南城在内的辽东地区，至大兴四年（321），慕容廆占领辽东地区最终得到了东晋朝廷的认可。
- [18]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第2821—2822页）：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皝迁都龙城。
- [19]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皝躬巡郡县，劝课农桑，起龙城宫阙。
- [20] 魏存成：《高句丽考古》，第74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裕群：《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第23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以下称《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李乐营：《佛教向高句丽传播路线的探析》，《社会科学战线》，第124—126页，2008年第11期。陈明华：《韩国佛教美术》，第2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国内学者、朝鲜半岛学者及日本学者也多持此观点。
- [21] 梁志龙：《高句丽儒释道三教杂论》，《北方文物》，第88—94页，2004年第2期。
- [22] 吴焯：《从向邻国的政治关系看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 [23] 温玉成：《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北方文物》，第32—38(70)页，2001年第1期。李海涛：《佛教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传播足迹考》，《全球化下的佛教与民族》（第三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第501—51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 [24] 日·木村宣彰（著），姚义田（译）：《昙始与高句丽佛教》，《博物馆研究》，第38—44页，2002年第2期。
- [25] 王飞峰：《冬寿墓莲花纹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 [26]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
- [27]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三十一·昙始传》，第956页，中华书

- 局，2006年：宋伪魏长安有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 [28] 唐·神清(撰)、宋·慧宝(注)、宋·德珪(注解)、富世平(校注)：《北山录校注·卷三·昙始传》，中华书局，第203页，2014年；晋昙始，孝武末(东晋也，帝临位，深奉佛法，苻坚兵至，谢玄破也)适辽东，高丽开导始也。后还三辅(三辅，咸阳县，昔秦皇于此置殿观)，三辅人宗仰之。
- [29] 元·无名氏(撰)：《神僧传·卷二·昙始传》：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
- [30] 本文图四：1、2分别引自성균관대학교 박물관：《新羅金石文拓片展》，성균관대학교 박물관，第121页图、第119—120页图，2008년。
- [31] 龙德为后梁末帝朱友贞的年号，仅仅使用了三年，即921—923年，此碑的龙德四年笔者暂定为924年。
- [3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第9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33]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993页，中华书局，2014年。
- [34] 《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第233页。
- [35] 温玉成：《高句丽“相之国”》，《北方文物》，第67(112)页，2004年第3期。
- [36] 本文图五：1引自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萃》，第101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以下称《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萃》。
- [37] 小泉顯夫：《平壤清岩里廢寺址(概報)》，《昭和十三年度古蹟調查報告》，朝鮮古蹟研究會，1940年。
- [38] 小泉顯夫：《泥佛出土地元五里廢寺址の調査》，《昭和十二年度古蹟調查報告》，朝鮮古蹟研究會，1938年。
- [39] 本文图五：2引自菊竹淳一、吉田宏志(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小學館，图版81，1997年。
- [40] 本文图五：3引自國立中央博物館：《三國時代佛教彫刻》，國立中央博物館，第121页，图102，1990年。
- [41] 《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第235页。
- [42] 金元龍：《蘆島出土金銅佛坐像》，《歷史教育》1961년 제5집。
- [4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
- [44] 田村晃一：《楽浪と高句麗の考古学》，同成社，2001年。
- [45] 東潮：《高句麗考古学研究》，吉川弘文館，1997年。
- [46] 희찬：《4세기 고구려 연화문외당의 개시연대에 대한 고찰》，《韓國思想과文化》제45집，2008년。
- [47] 백종오：《고구려 기와의 성립과 왕권》，주류성，2006년。
- [48] 千田剛道：《瓦からみた高句麗古都集安》，《青丘學術論集》，1994年第5集。
- [4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王陵》，文物出版社，2004年。以下称《集安高句丽王陵》。池内宏：《通溝》(上)，日滿文化協會，1938年。以下称《通溝》等。
- [50] 集安市博物馆：《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2112号墓》，《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集安禹山M2112墓室清理简报》，《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第292—299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 [51] 耿铁华、尹国有：《高句丽瓦当》，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58页，2001年，以下称《高句丽瓦当》。
- [52]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上、下和龙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5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国内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
- [5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以下称《丸都山城》。
- [55] 《集安县文物志》编写组：《集安县文物志》，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1984年。《高句丽瓦当》等。
- [56] 王洪峰等：《辽源市文物志》，吉林省文物志编辑委员会，1988年。
- [57] 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编写组：《延边文物简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88年。

- [58] 渡邊三三、齋藤武一：《滿洲國撫順の古瓦に就て》，《考古學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一一號，1939年。  
徐家国、孙力：《辽宁省抚顺高尔山城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三上次男、田村晃一：《北関山城-高爾山山城：高句麗新城の調査-》，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9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抚顺市博物馆：《辽宁省抚顺市施家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0期。《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编辑委员会：《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第258—259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以下称《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或《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等
- [59] 佟达：《新宾五龙高句丽山城》，《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 [60] 周向永：《西丰城子山山城始建年代再考》，《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周向永、许超：《铁岭的历史与考古》，辽海出版社，2010年。
- [61]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第301页。
- [62] 苏鹏力：《灯塔市燕州城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第195—19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 [63]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第249—250页。
- [64] 崔玉宽：《凤凰山山城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李龙彬、华玉冰、崔丽萍：《辽宁丹东凤凰山山城首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23日。李龙彬、司伟伟、崔丽萍：《辽宁丹东凤凰山山城考古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15日。《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第255页。
- [65] 杨永芳、杨光：《岫岩境内五座高句丽山城调查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 [66] 郭富纯、赵锡金(主编)：《大连古代文明图说》，第24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州市文物局(王飞峰等)：《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17年第12期。
- [68] 김일성종합대학 고고학및민속학강좌：《대성산 일대의 고구려 유적에 관한 연구》，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3년。
- [69] 石光濬：《高句麗考古学の新しい成果》，《古代朝鮮の考古と歴史》，雄山閣，2002年。
- [70] 김일성종합대학：《동명왕릉과 그 부근의 고구려유적》，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6년。
- [71] 崔鐘澤、李秀珍외：《紅蓮峰第1堡壘—發掘調査綜合報告書—》，高麗大學校考古環境研究所，2007년。
- [72] 2016年9月7日在峨嵯山城的发掘中发现与红莲峰第1堡垒出土瓦当纹样相同的莲花纹瓦当，见강승현(기자)：《아차산성서 고구려 유물 “연화문와당” 발견》，《동아일보》，2016년 9월 8일。
- [73] 심광주외：《漣川瓠蘆古壘III》(第2次發掘調査報告書)，한국토지공사 토지박물관，2007년。
- [74] 王飞峰：《丸都山城宫殿址研究》，《考古》，2014年第4期。
- [75] 關野貞：《滿洲輯安縣及び平壤附近に於ける高句麗時代の遺跡》(二)，《考古學雜誌》第五卷第四號，1924年。
- [76]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
- [77] 方起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 [78] 姜賢淑：《中國吉林省集安東台子遺蹟再考》，《한국고고학보》제75집，한국고고학회，2010년。
- [79] 《三国史记·卷第十八·故国壤王本纪》(第223页)：九年(392)……三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由于《三国史记》所记故国壤王年代为384—392年，实际上依据好太王碑资料故国壤王年代为384—391年，因此笔者倾向于东台子建筑为故国壤王八年(391)高句丽的国社和宗庙遗迹。由于《三国史记》在故国壤王纪年问题上多出一年，因此本文在引用故国壤王及好太王年代时均做了调整。
- [80] 王飞峰：《关于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的几个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81] 王飞峰：《吉林集安东台子遗址研究》，《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 [82] 本文图六：1、2分别引自《集安高句丽王陵》，图版七二：1、第194页，图一五六。
- [83] 井上直树：《集安出土文字資料からみた高句麗の支配体制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安岳三号墳・徳興里古墳にみえる被葬者の職位の再検討と府官制—》，《朝鮮學報》第二百三輯，2007年4月。
- [84] 王飞峰：《关于集安高句丽碑的几个问题》，《集安麻线高句丽碑》，文物出版社，2014年。
- [85] 王飞峰：《高句丽卷云纹瓦当研究》，《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2014)，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
- [86]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第73页。
- [87] 本文图七：1引自郭富纯、赵锡金(主编)：《大连古代文明图说》，第24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88] 本文图七：2引自《集安出土高句丽文物集萃》，第56页。
- [89] 本文图七：3为笔者拍摄。
- [90] 本文图七：4引自《丸都山城》，图版八七：2。
- [91] 本文图七：5引自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刚等)：《集安将军坟西南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图版四：5。
- [92] 《旧唐书》(第5320页)。
- [93]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晋纪二十八》(第3379—3407页)：(太元十年，385年)六月，高句丽寇辽东。佐遣司马郝景将兵救之，为高句丽所败，高句丽遂陷辽东、玄菟……(十一月)慕容农至龙城……进击高句丽，复辽东、玄菟二郡。
- [94]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第3562页)：(隆安四年，400年，春正月)高句丽王安事燕礼慢；二月，丙申，燕王盛自将兵袭之，以骠骑大将军熙为前锋，拔新城、南苏二城，开境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而还。
- [95]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晋纪三十四》(第3599页)：(元兴元年，402年，五月)高句丽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
- [96]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晋纪三十五》(第3633页)：(元兴三年，404年，十二月)高句丽侵燕。
- [97] 金毓黻：《东北通史》，第233—234页，(台湾)乐天出版社，1971年。
- [98] 《隋书·卷九八·来护儿传》(第1515—1516页)：来护儿字崇善，江都人也……(大业)十年，又帅师度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第6332页)：(贞观十九年四月)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其城四面悬绝，惟西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文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第5323页)：五月，张亮副将程名振攻沙卑城，拔之，虏其男女八千口。
- [99] 本文图八：1、2引自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남북역사학자협의회：《남북공동 고구려벽화고분 보존 실태 조사 보고서》(제2권 도판),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2006년, 第31页, 图27。
- [100] 本文图八：3引自《集安高句丽王陵》，图版一〇九：5。
- [101] 卢兆荫：《略论两汉魏晋时期的帷帐》，《考古》，1984年第5期。
- [102] 易水(杨泓)：《帐与帐构》，《文物》，1980年第4期。
- [103] 李庆发：《辽阳上王家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7期。
- [104] 王飞峰：《冬寿墓莲花纹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 [105] 李新全：《三燕瓦当考》，《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4期。
- [106] 王飞峰：《三燕瓦当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2012年。王飞峰：《高句丽瓦当研究》，高麗大學校大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 [107] 桃崎祐辅：《高句麗太王陵出土瓦・馬具からみた太王陵説の評價》，《海と考古學》，六一書房，2005年。
- [108] 姜賢淑：《中國吉林省集安東台子遺蹟再考》，《한국고고학회》제75집, 한국고고학회, 2010년



# 三燕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およびその関係

王飛峰

三燕考古学と高句麗考古学は長きにわたり、東北アジアにおける学术界の関心の的であり、三燕と高句麗、両国の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およびその関連研究もまた、その重要な研究課題の一つである。これは三燕と高句麗が長時間にわたり境を接していたから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両者の蓮華文瓦当が密接な関係を示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現在のところ、三燕と高句麗の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に関して、とくに高句麗における出現時期については、各国研究者間になお一定の意見の相違がある。そしてその影響関係についても、学界では異なる見解が示されている。そこで本稿では、三燕と高句麗の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およびその関係について、筆者の見解を述べる。

## 1. 三燕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の出現

仏教は後漢末年に西域より中国に伝わり、三国・西晋期に一定の発展をみせ、そして東晋・十六国期に急速な発展期へといたった。中国東北地区における仏教の伝播時期は明確ではないが、遅くとも前燕初期には、仏教はすでに中国東北地区である程度発展していた。永和元年（345）、前燕の慕容皝は龍城附近の龍山に龍翔仏寺<sup>(1)</sup>を建てた。これは現在、東北地区でもっとも古い仏教寺院として知られ、仏教が前燕領域内で統治階級に許されていた重要な証左である。仏教の重要な装飾文様のひとつである蓮華文は、中国伝播後、とくに中国古典建築と結びつき、蓮華文に関係する一連の文様と建築部材等を創出した。蓮華文瓦当はすなわち、そのなかの代表的なものである。現在の考古出土資料では、蓮華文瓦当は早くも戦国時代の建築において、すでに使用が確認される。そして南北朝およびその後、流行した蓮華文瓦当は、蓮華の特徴、瓦当面の蓮華の配置、中房の変化などの面において、いずれも秦漢瓦当の影響がみられる<sup>(2)</sup>。またある研究者は、蓮華文瓦当は早くも戦国期秦の瓦当において、すでに出現しているが、写実的手法によって現実世界の蓮華を題材として芸術的に彫ったもので、南北朝期の仏教の影響を受けて生み出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とは形態と起源が異なるだけでなく、さらに重要なのは、そこに込められた思想観念であり、両者には天地の違いがあると指摘する<sup>(3)</sup>。十六国期が始まり、とりわけ南北朝と隋唐期の蓮華文瓦当は疑いなく仏教の影響を受けて出現したものである。三燕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はこれと同様に、仏教の影響下で出現したものであり、その出現を論じる前に、蓮華文瓦当の認定と編年について説明をする必要がある。

三燕の都城が置かれた龍城、薊城、鄴城、中山は、三燕以降も何度も城市が建設され、三燕の遺跡、とりわけ宮殿址の特定はかなり難度が高い。三燕の宮殿などの建築遺跡に関連する考古調査は多くなく、くわえて十六国期の比較可能な瓦当資料が多くないなどの要因が、三燕の瓦当の認定および編年を困難にしている。三燕瓦当の認定は龍城、薊城、鄴城、中山の4ヵ所の地とその付近地区から着手し、すでに発掘によって出土した三燕と関連する遺物のなかから探さなければならぬと考える。三燕都城の龍城およびその周囲の朝陽北大街<sup>(4)</sup>、朝陽北塔<sup>(5)</sup>および北票市金嶺寺建築遺跡<sup>(6)</sup>などから、三燕と関係する瓦当資料が出土している。薊城(350~357年)と中山(385~397年)が前燕と後燕の都城であった時間は長くなく、現在のところ前燕と後燕と関係する瓦当資料はみつかっていない。鄴城遺跡の報告済みの瓦当資料のなかには、朝陽と北票に所在する金嶺寺建築遺跡で出土した瓦当と似た資料があり<sup>(7)</sup>、我々は三燕期の資料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

三燕蓮華文瓦当の類型および年代について、筆者はかつて論文「三燕瓦当研究」の中で整理したことがあり、ここではこの論考をもとに、三燕蓮華文瓦当の類型、変遷、年代について簡単に述べたい。現在、龍城遺跡からはA型Ⅰ式蓮華文瓦当(図一-1)とBa型蓮華文瓦当(図一、5)がいずれも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形態から前燕期(341~350年)の遺物と判断できる。A型Ⅱ式蓮華文瓦当(図一-2)とBb型蓮華文瓦当(図一-9~14)は龍城遺跡と北票市金嶺寺建築遺跡等からも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時期は後燕中山期(385~397年)と考えられる。A型Ⅲ式瓦当(図一-3)とA型Ⅳ式瓦当(図一-4)は龍城遺跡と金嶺寺建築遺跡等で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時期はそれぞれ後燕慕容熙期(401~407年)、北燕期(407~436年)となるだろう。幾何学文瓦当(図一-6)とC型蓮華文瓦当(図一-7)はともに鄴城遺跡で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時期は前燕鄴城期(357~370年)であろう。D型蓮華文瓦当(図一-8)は龍城遺跡でのみ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時代は前燕の鄴城遷都前(357年)と考えられる。

ここで注意すべきは、金嶺寺建築遺跡の性格と年代は三燕瓦当の時期区分において非常に重要な意義を有しているが、目下学界ではこの遺跡の性質と年代の認識について、なお若干の相違が存在する点である。金嶺寺建築遺跡の発掘概報は、この建築群は慕容部が遼西大凌河流域に居を定めて久しくない前燕および前燕以前の時期で、初期の格式の高い建築址であるとする<sup>(8)</sup>。筆者は、この遺跡は後燕期の慕容垂「宗廟、社稷を繕う」と関係し、網状地文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後燕中山期、幅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慕容熙期の遺物であるとする<sup>(9)</sup>。田立坤は、おそらくこの建築は前燕慕容皝期に修築した「慕容廆廟」であろうと述べるが、金嶺寺建築遺跡で出土した2種類の瓦当の時期についてはいまだ説明をしていない<sup>(10)</sup>。後燕建国時の首都である中山(現・河北省定州市)からは三燕期の瓦当あるいは遺物が出土していないために、金嶺寺建築遺跡の性格と年代は、今後、定州市

で出土する後燕期の瓦当によって決まるところが非常に大きい。すなわち、もし定州で出土する瓦当が網状地文の蓮華文瓦当と類似するのであれば、金嶺寺建築遺跡の創建年代は後燕慕容垂期であるので、網状地文のある瓦当は後燕慕容垂期とすべきで、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後燕慕容熙期である。反対に、もし定州で出土する瓦当が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と類似するのであれば、金嶺寺建築の創建年代は前燕慕容皝期であり、網状地文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前燕期とすべきで、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後燕慕容垂期であろう。この他に、金嶺寺建築遺跡で発見されたいくつかの遺物が、この建築群が北燕期まで使用され続け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遺跡からは、かつて1点の薄い灰色の細砂岩質の礎石(図二-1)が出土した。礎石の頂部は八弁蓮華文を飾り、側面は波状文を陰刻するが、この波状文が馮素弗墓出土の石製硯(図二-2)側面の文様と似ているだけでなく<sup>(11)</sup>、両者の素材はともに細砂岩で、さらに彫刻技法もほぼ一致する。

上述の分析を通じて、前燕期にはすでに蓮華文瓦当が出現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蓮華文瓦当のなかにはすでに網状地文の蓮華文瓦当があり、また輻線のない蓮華文瓦当と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があり、とくに後二者はのちの高句麗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の主要型式となった。A型I式とBa型蓮華文瓦当の蓮弁の間には小さく短い線があり、これと類似する蓮弁は後趙期の「大趙萬歳」瓦当<sup>(12)</sup>(図三-1)にみられる。このため三燕蓮華文瓦当のうち、初期の蓮華文瓦当は、後趙期のこのタイプの文様の影響を受けた可能性がある。後趙期は仏教が盛行し、後趙地区で出現した蓮華文に關係する瓦当は、疑いなく仏教文化の影響を受けた結果である。これにくわえて、後趙はかつて前燕と直接、境を接し、往来は密接であったため、この時期に仏教が後趙より前燕に伝来したであろうと推測される。そして前燕地区で伝播が始まり、345年に慕容皝が龍翔仏寺を建立した時には、仏教は前燕域内ですでに發展段階に入っていた。

東北地区の三燕と類似する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は、さらに新賓県の永陵南城で出土した双輻線四葉文瓦当<sup>(13)</sup>(図三-2)、日本統治期に撫順市永安公園を改修した時に出土した漢代の「千秋萬歳」瓦当(図三-3)、卷雲文瓦当<sup>(14)</sup>(図三-4)がある。このうち、卷雲文瓦当の瓦当面はさらに四つの花葉文で飾っており、これと似た半瓦当が1980年代の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による永陵城調査中にも発見されている<sup>(15)</sup>。この調査では、「千秋萬歳」瓦当と双輻線四葉文瓦当(報告では瓦当図案を魏晋期の蓮華文瓦当としている<sup>(16)</sup>)が出土した。このため永陵南城出土の双輻線四葉文瓦当は、当地の文字瓦である「千秋萬歳」瓦当と花葉文を飾る卷雲文瓦当が結合した産物であると考え、仏教の影響を受けて生み出された伝統な意味をもつ蓮華文瓦当ではなく、その年代上限は上述の漢代「千秋萬歳」瓦当と卷雲文瓦当より後と考えた。永陵南城出土の双輻線四葉文瓦当は規格がそろい、比較的高温で焼成されており、三燕瓦当と比べて明らかな違いがある。このタイプの瓦当は三

燕瓦当に属さないだけでなく、慕容鮮卑の侵攻前に当地で製作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そのためその年代の下限は慕容鮮卑の遼東占領、すなわち東晋の太興二年（319）以降になることはない<sup>(17)</sup>。したがって、三燕蓮華文瓦当中の輻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の創出は、永陵南城の双界輻四葉文瓦当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に違いない。

それゆえ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出現は、前燕の龍城遷都前後（341年）、あるいはやや遅い時期と考えられ、仏教が前燕地区に伝来した直接の産物ではないが、慕容皝の龍城遷都や新都建設等の活動と関係する。例えば、咸康七年（341）、慕容皝は龍城に遷都する前、陽裕と唐柱らを充てて龍城宮殿と宗廟等を建設している<sup>(18)</sup>。龍城遷都後、郡県を巡視して農業の発展を促すほか、慕容皝はさらに龍城宮闕を修繕している<sup>(19)</sup>。

## 2. 高句麗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の出現

現在の研究状況からみて、高句麗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発生 の主要条件は以下の2点が含まれる。第1点目は仏教の高句麗伝来、第2点目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影響である。そのうち三燕蓮華文瓦当が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に与えた影響に焦点をあて、以下に論述する。ここで重点的に論じるのは、仏教が高句麗に伝わった時期、および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発生等である。

仏教がいつ高句麗に伝わったのかについて、研究者の意見は一致しているとはいえず、主要なものを概括すると次のとおりである。一つ目は『三国史記』の記載にもとづき、372年に仏教は前秦の僧順道によって高句麗へ伝わったとする見解である<sup>(20)</sup>。二つ目は、冬寿墓に描かれる蓮華文から、357年以前の4世紀中葉に仏教はすでに高句麗に伝わっており<sup>(21)</sup>、さらには冬寿本人が仏教信徒であったであろうと考える見解である<sup>(22)</sup>。三つ目は、『高僧伝』中の支道林（314～366年）と“高麗道人書”の記載から、“高麗道人”を当時の高句麗の仏教徒と考え、366年以前に仏教がすでに高句麗に伝わっていたとするものである<sup>(23)</sup>。四つ目は、『高僧伝』や『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等の曇始関連の記載から、東晋太元二十年（太元は東晋孝武帝の年号で、376～396年である。太元二十年はすなわち395年にあたる）に仏教が東晋の僧曇始によって高句麗に伝わったとする見解である<sup>(24)</sup>。五つ目は、『高僧伝』や『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等の曇始関連の記載ならびに朝鮮半島と高句麗で発見された仏像資料等から、仏教は東晋太元年間末期（約390～396年）に後秦の僧曇始によって高句麗に伝わったとする<sup>(25)</sup>。このうち第一番目の観点が目下、学界での主要な見解である。以上の各観点は、現在、目にするところのできる文献史料を基礎としている。実際の考古学的証拠は多くないため、まず関連する文献史料に対して整理することとする。

現在、目にするところのできる高句麗への仏教伝来に関する記録のうち最古のものは、南

梁の僧惠皎（497～554年）が撰写した『高僧伝』で、『高僧伝』巻10 曇始伝に「積曇始は関中人なり。出家自り以後、多く異迹有り。晋孝武太元之末、経律数十部を齎り、遼東に往きて宣化し、三乗を顕授し、以て帰戒を立てり。蓋し高句驪道を聞く之始なり。義熙初、復た関中に還り、三輔を開導す。」<sup>(26)</sup>とある。惠皎撰『高僧伝』から元代に至るまで、中国歴代文献の『法苑珠林』<sup>(27)</sup>、『北山録』<sup>(28)</sup>、元代の『神僧伝』<sup>(29)</sup>等の曇始に関する記録は、いずれも『高僧伝』を基礎にするか、あるいは直接援用、あるいはやや要約をくわえているが、大きな相違はない。

朝鮮半島の史料のなかで、仏教が高句麗に伝来したという最古の記録は、統一新羅末期の著名な学者である崔致遠（857～？年）が撰写した『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正式名称は『大唐新羅国故鳳岩山寺教諭智証大師寄照之塔碑銘并序』）である。『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sup>(30)</sup>（図四-1・2）は韓国慶尚北道聞慶市加恩邑院北里の鳳岩寺にあり、韓国宝物第138号である。碑高2.73m、幅1.64m、厚さ0.23mを測る。螭首亀趺を備え、碑背面末文に「龍徳四年歳次甲申六月□□竟建」の題記がある。龍徳は五代後梁の年号で、龍徳四年はすなわち924年で<sup>(31)</sup>、この碑文の開始部分は仏教が朝鮮半島に伝わった過程を叙述している。

第3列末部～第4列上部：「昔、当東に鼎峙之秋表れ、百済に蘇塗之儀有り、甘泉の金人之祀の若し。厥の後西晋の曇始之を貊に始める、撰騰の東して入るが如く、句驪の阿度我に渡る、康会の南行するが如し」。崔致遠は曇始のいた時代を誤って西晋とするが、かえって曇始が高句麗に入って法を伝えた事実を記録している。碑文中の「曇始之を貊に始める、撰騰の東して入るが如し」は、後漢明帝期に洛陽にいたった西域僧の撰摩騰、竺法蘭と同様に、曇始が高句麗にいたり、仏教を高句麗に広めはじめたことを述べている。唐代の高句麗人はまた、高句麗を貊と自称した。この点は高句麗滅亡後に唐に居住した泉男生の子、泉献誠墓誌（大足元年（701））のなかで証明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君、諱は献誠、其の先高句麗人なり。……公即ち襄公の嫡子なり。小貊之郷に生まれ、早く大成之用有り、地榮門寵、一国に儔罕なり。」<sup>(32)</sup>。

唐の道宣（596～667年）撰『続高僧伝』巻26 积僧意伝に、「积僧意、……元魏中、泰山朗公谷の山寺に住み、徒を聚めて教授し、暮齒に迄るまで精誠にして倦まず。寺に高驪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呉国像、昆侖像、岱京像有りて、此くの如き七像并せて是れ金銅、俱に寺堂に陳び、堂門常に開く。而れど鳥獸敢えて入る者無く、今に至まで猶爾のごとし」<sup>(33)</sup>とある。一部の研究者はここで述べる高驪像とは高句麗仏像で、この仏像は前秦期（351～394年）に高句麗が竺僧朗に贈ったものとする<sup>(34)</sup>。またある研究者は、ここで述べる高驪像、相国像はともに高句麗仏像で、このうち相国像は好太王期（391～412年）に高句麗「相国」が竺僧朗に贈ったものであろうと指摘している<sup>(35)</sup>。目下、高句麗の仏

像資料は、中国・北朝鮮・韓国内でいずれも発見されている。中国人研究者は1985年に国内城で一尊の金銅仏<sup>(36)</sup>（図五-1）を発見した。北朝鮮で発見された仏像資料は比較的多く、一部は1945年以前の日本人研究者による高句麗仏寺発掘（平壤清岩里土城内の清岩里廢寺址<sup>(37)</sup>や平安南道平道郡徳山面の元五里廢寺址<sup>(38)</sup>等）の出土品あるいは採集品である。韓国で発見された高句麗仏像<sup>(39)</sup>（図五-2）は多くが採集品である。朝鮮半島で発見された高句麗地区の仏像の年代は、ソウル市蘆島で発見された一尊の金銅仏像<sup>(40)</sup>（図五-3）以外は、大体において5世紀初めを上らないものである。またある研究者は、蘆島金銅仏は高句麗仏像に属すが、5世紀初めに中国北方地域で製作されたと推測する<sup>(41)</sup>。韓国人研究者の金元龍も、蘆島仏像は中国から舶載した可能性が非常に高いと考えている<sup>(42)</sup>。しかし仏像出土地の周囲はいずれも百濟墓制と遺跡が位置し、高句麗と関連する遺跡や遺物は発見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から、この仏像はおそらく高句麗仏像ではない。

したがって恵皎『高僧伝』のなかの中国史料、崔致遠撰写『鳳岩寺智証大師寄照塔碑』および高句麗から発見された仏像資料等を参考に、仏教は東晋太元末年（約390～396年）に後秦の関中の僧曇始によって高句麗へと伝えられたと考えられ、曇始は当時、おそらく関中を出発して陸路で遼西に到り、遼東を経て高句麗へ入ったのであろう。

現時点での考古資料で言えば、高句麗の瓦当は卷雲文瓦当から出現し、卷雲文瓦当が消失した後に蓮華文瓦当、忍冬文瓦当、獸面文瓦当などが出現する。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が出土する遺跡は、主に生活遺跡と古墳の両者があり、このうち生活遺跡で出土する蓮華文瓦当は赤褐色が多く、瓦当面には基本的に輻線がない。墓葬上で出土する蓮華文瓦当は基本的に灰褐色で、瓦当面には輻線があるものが多い。蓮華文瓦当の色調の違いと輻線の有無が遺跡の性質と密接に関連するという特徴は、国内城期の蓮華文瓦当創出後に比較的顕著であり、平壤遷都後にはみられない。

2004年出版の報告書『丸都山城』<sup>(43)</sup>では、丸都山城宮殿址は342年に前燕慕容皝が丸都山城を攻め落とした戦火で毀損したとし、発掘担当者は342年の高句麗ですでに蓮華文・忍冬文・獸面文瓦当が出現していたと述べている。日本人研究者の田村晃一<sup>(44)</sup>、東潮<sup>(45)</sup>等、韓国人研究者の金希燦<sup>(46)</sup>、白種伍<sup>(47)</sup>等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冬寿墓にみられる蓮華文の影響を受けて生み出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とし、最古期の蓮華文瓦当は、太王陵で発見された蓮弁上にY字形（すなわち蓮の蕾形の蓮弁：筆者註）の双輻線六弁蓮華文瓦当で、4世紀中後期頃に比定している。またある研究者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うち、輻線のある瓦当の出現年代は比較的早く、4世紀後半に発生し、輻線のない蓮華文瓦当の上限年代は6世紀初めから前半とする<sup>(48)</sup>。現在、中国と朝鮮半島の高句麗遺跡からは、ともに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が発見されており、このうち集安と平壤地区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は数は多くないものの、形態は複雑である。国内城期の集安地区において蓮華文瓦当が出土し



た墓は、主に千秋墓、太王陵、將軍塚<sup>(49)</sup>、禹山2112号墓<sup>(50)</sup>、長川2号墓<sup>(51)</sup>、上活龍5号墓<sup>(52)</sup>等があり、蓮華文瓦当が出土した遺跡には、国内城<sup>(53)</sup>、丸都山城<sup>(54)</sup>、東台子遺跡と梨樹園子南遺跡<sup>(55)</sup>等がある。その他の地域の遺跡として、吉林省遼源市の龍首山山城<sup>(56)</sup>、延辺朝鮮族自治州の温特赫部城<sup>(57)</sup>、遼寧省撫順市の高爾山山城とその付近にある施家墓地<sup>(58)</sup>、新賓県の五龍山城<sup>(59)</sup>、西豊県の城子山山城<sup>(60)</sup>、遼陽市の金銀庫遺跡<sup>(61)</sup>と燕州城<sup>(62)</sup>、丹東市の鬚河尖古城<sup>(63)</sup>、鳳城市の鳳凰山山城<sup>(64)</sup>、岫岩県の娘娘山城<sup>(65)</sup>、大連市の大黒山山城<sup>(66)</sup>、蓋州市の青石嶺山城<sup>(67)</sup>等がある。北朝鮮領内の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が発見された遺跡は多くが平壤地区に分布しており、主なものとして平壤城、大城山城<sup>(68)</sup>、長寿山城<sup>(69)</sup>、定陵寺<sup>(70)</sup>等がある。韓国内において高句麗蓮華文が出土した遺跡には、ソウル市の紅蓮峰1号堡壘<sup>(71)</sup>と嵯峨山城<sup>(72)</sup>、京畿道漣川市の瓠蘆古壘<sup>(73)</sup>等がある。

現在、発見されている蓮華文瓦当の形態と製作技法等からみて、集安地区の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その他の地区の高句麗遺跡から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よりも古相をみせる。このため、高句麗最古の蓮華文瓦当は、集安地区の上位階級の遺跡である丸都山城宮殿址や東台子遺跡、千秋墓等の出土品の中にあるに違いないと考えられる。

丸都山城宮殿址は、その年代の下限を342年と報告されているが、現在発掘された宮殿区はおそらく慕容皝が丸都山城を攻め落とした後、好太王十七年(407)に再び基址を選んで「宮闕を増修」(『三国史記』卷18 広開土王本紀:「十七年春二月、増修宮闕」)した結果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そうであれば、丸都山城の早期宮殿址および慕容皝が焼き払った宮殿址の搜索もまた、国内城期の高句麗考古学の重要な研究課題となる<sup>(74)</sup>。丸都山城の瞭望台と各門址で発見された瓦当は、宮殿址出土瓦当と色調・胎土・文様において基本的に一致する。したがって、これら瓦当の一部は好太王期のもので違わず、丸都山城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忍冬文瓦当・獸面文瓦当の出現年代は好太王十七年(407)より後ではなく、その下限は平壤遷都(427年)であるとみることができる。

東台子遺跡は、高句麗遺跡のなかでは早い時期に日本の研究者によって発見され、さらに関野貞によって報告され<sup>(75)</sup>、解放前には遺跡の一部がすでに破壊されていた。1958年に吉林省博物館が東台子遺跡を発掘し<sup>(76)</sup>、高句麗期の重要な建築遺跡であると報告した。1982年には方起東<sup>(77)</sup>が東台子遺跡の規模と配置等について研究をおこない、故国壤王九年(392)三月に造営された国社と宗廟遺跡であると発表した。2010年には韓国人研究者の姜賢淑<sup>(78)</sup>が東台子遺跡出土遺物などの研究から、その年代を5世紀末以降、渤海滅亡前とした。筆者は東台子遺跡の出土遺物と関連遺跡、文献史料等について系統的な整理をおこない、東台子遺跡は故国壤王八年(391)<sup>(79)</sup>三月に造営が命じられた国社と宗廟と考えたが、同年五月に故国壤王は世を去り、おそらく当時の建築は結局完成しなかったため

に瓦当も使用されることがなく、もし故国壤王期に造営した国社と宗廟が瓦当を使用したとすれば、千秋墓上で出土した卷雲文瓦当と類似する瓦当であったに違いないと考えた<sup>(80)</sup>。そうであれば、東台子遺跡出土の大量の蓮華文瓦当・忍冬文瓦当・獸面文瓦当は故国壤王期の遺物ではなく、好太王期の修繕時に使用した瓦当であるはずで、一部の瓦当は丸都山城宮殿址で発見された瓦当と文様が同一あるいは類似し、さらには両遺跡間で同範瓦当が存在するため、東台子遺跡の一部の蓮華文瓦当の年代は、丸都山城の同型式の出土品と一致するはずである<sup>(81)</sup>。

2003年に千秋墓で「永楽」銘文を刻んだ丸瓦<sup>(82)</sup>（図六-1・2）が1点出土した。泥質灰陶で、残長13.0cm、幅15.5cm、厚さ1.5cmである。丸瓦凸面に2行にわたる銘文がみられ、全部で8文字が残る。『集安高句麗王陵』が発表した積文は、右行「(楽) 浪趙將軍」、左行「□未在永楽」と積読する。しかし、「(楽) 浪趙將軍、□夫任永楽」と読む研究者もいる<sup>(83)</sup>。丸瓦上に残った字形と文意からみて、『集安高句麗王陵』が示す積文がより信頼でき、かつそこでは、これは好太王期に千秋墓を造営するのに用いた瓦であるとしており、好太王の在位年代（391～412年）にもとづいて左列の銘文を推測すると、「(乙あるいは丁) 未在永楽」となる。筆者は高句麗の葬俗および丸瓦上の「未」字の上一字の筆体等の検討から、この銘文は「(楽) 浪趙將軍」、「(丁) 未任永楽」と考える<sup>(84)</sup>。好太王碑第4面第7～9行に「上祖先王自り以来、墓上に石碑を安ぜず、守墓人烟戸をして差錯せしむに致り、惟れ国岡上広開土境好太王、尽く祖先王墓の上に碑を立てるを為し、其の烟戸を銘し、差錯せしめず。又制するに、守墓人自今以後、更に相転売するを得ず。富足之者有ると雖も、亦た擅に買うを得ず。其の令に違有らば、売者は之を刑し、買人は制して之を守墓たらしむ。」とある。好太王期には守墓制度と関係する一連の律令が制定されており、さらにかつて「祖先王墓」上に碑を立てたと碑文中にあることから、立碑と同時に一部陵墓に対して修繕を行ったことはまた、道理にかなっている。千秋墓出土の瓦当中にはすでに高句麗卷雲文の最終段階の無銘文卷草文瓦当があり、また蓮華文瓦当がある。千秋墓で発見された双輻線六弁蓮華文瓦当は太王陵、將軍塚の同型式の瓦当と比べてやや古い特徴が表れている<sup>(85)</sup>。このため、集安地区の王陵において、千秋墓は高句麗卷雲文瓦当が消失し、蓮華文瓦当が出現する過渡期の陵墓であるといえる。千秋墓上で「丁未」と推定される銘文丸瓦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から、千秋墓は好太王が丁未年（407）に修繕した父親の故国壤王の陵墓であると考えられ、双輻線六弁蓮華文瓦当を使用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これら瓦当の年代は407年前後であるはずである。

以上の分析から、集安地区の当時の高句麗王宮遺跡（丸都山城宮殿址）、国社と宗廟遺跡（東台子遺跡）と王陵（千秋墓）という上位階級の遺跡から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の出現年代は、好太王期の丁未年（407）より遅くないと考えられる。集安地区のその他の遺跡か

ら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は、その出現年代は三遺跡の蓮華文瓦当の年代より遡及しえない。よって、高句麗最古の蓮華文瓦当は集安地区で出現し、当時の高句麗の国社と宗廟、宮殿、王陵等の遺跡から出土するが、その重要な要因のひとつは、太元末（約390～396年）に後秦の僧曇始が仏教を高句麗地区に伝えたことである。仏教伝来は高句麗人の社会生活に重要な影響をおよぼし、この後、高句麗墓壁画中の蓮華文が一種の仏教的意味を含んだ装飾文様となって“爆発的”に現れはじめ、高句麗滅亡まで描かれ続けた。

そして大黒山山城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と斜格子文面戸瓦が上述の推測を裏付ける。大黒山山城は大連市金州区大黒山山頂に位置し、平面は不規則形で、周囲長は約5000m、城内ではかつて「卑沙」、「畢奢」等の銘文のある土器片が採集されている<sup>(86)</sup>。城内ではさらに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と斜格子文面戸瓦が出土しており、現在、旅順博物館に収蔵されている。蓮華文瓦当（図七-1）<sup>(87)</sup>の文様と蓮弁形態などは、東台子遺跡で出土した蓮華文瓦当（図七-2）<sup>(88)</sup>と比較的似ており、斜格子文面戸瓦（図七-3）<sup>(89)</sup>は九都山城宮殿址（図七-4）<sup>(90)</sup>、將軍塚西南建築址（図七-5）<sup>(91)</sup>で発見された資料と非常に類似する。瓦は高句麗期において一種の身分と階級を象徴する表示物であり、『旧唐書』卷199上 高麗伝に「其の居る所必ず山谷に依り、皆茅草を以て舎を葺くも、唯仏寺、神廟及び王宮、官府乃ち瓦を用いる」<sup>(92)</sup>とある。大黒山山城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瓦当と面戸瓦は、好太王の高句麗による遼東地区占領の公示を反映しているだろう。高句麗がはじめて遼東地区を占拠したのは故国壤王二年（385）六月の遼東郡と玄菟郡に対する侵攻によるが、同年十一月に後燕の将の慕容農に取り戻された<sup>(93)</sup>。400年になると、後燕はなお勢力を有しており大挙して高句麗を侵攻し、高句麗の新城・南蘇の2城を破り、700余里の地を拓いた<sup>(94)</sup>。402年、高句麗は宿軍城を攻め、後燕の平州刺史慕容暉を逃走させた<sup>(95)</sup>。さらに404年、高句麗は燕を攻めた<sup>(96)</sup>。金毓黻はこの1年が高句麗が遼東を占領した最後であると考え、『東北通史』において「高句麗が晋の太元十年六月に初めて遼東・玄菟の二郡を陥落させ、この年の十一月末に燕が二郡を回復した。これはすなわち高句麗故国壤王二年（385）である。また19年後の晋元興三年になると、遼東は再び陥落し、玄菟郡もまた同時に陥落したが、これは広開土王十四年（404）である。そしてついに再び回復することはできず、唐高宗の総章元年（668）の高句麗が滅亡した日に、遼東の故地ははじめて復したが、然るにすでに陥落して265年、久しきと言うべきである」と述べた<sup>(97)</sup>。大黒山山城の蓮華文瓦当と面戸瓦の発見は金毓黻の見解とも一致し、考古学的証拠を与えた。これら資料の年代は高句麗の遼東占拠後、間もなくであるに違いなく、その上限年代は東晋元康三年（好太王十四年（404））以降のある時期だが、好太王期の丁未年（407）より前とみることはむしろかしく、下限は高句麗の平壤遷都（427年）である。

大黒山山城は遼東半島最南端に位置する高句麗山城で、大黒山山頂に泰然と座して大連

湾地区を守備する、高句麗のこの地域における重要な軍事拠点であった。隋唐期の高句麗侵攻時、山東半島から海を渡ってやってきた隋唐軍がこの地域で最初に攻めた場所は大黒山山城であった<sup>(98)</sup>。好太王は高句麗中期の王の一人で、輝かしい武功で勲功極めて高く、当然、大黒山山城の重要性を認識していたとみられる。城内での瓦当と面戸瓦の使用には山城としての位置づけが表わされているが、その一方で先王や祖先、ないしは対後燕の武勲顕彰の意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ことも排除できない。

冬寿墓内で発見された蓮華文、特に冬寿の座帳の両角に現れた蓮蕾形蓮華<sup>(99)</sup>（図八-1・2）は、太王陵上から発見された蓮蕾形蓮華文瓦当<sup>(100)</sup>（図八-3）の蓮蕾形と類似し、これはまた多くの研究者が、太王陵で発見された瓦当が高句麗最古の蓮華文瓦当であると重要な根拠である。冬寿夫婦の坐像は共に帳帷の内にあり、帳帷を副葬品とする習俗は戦国から南北朝期まで連綿とつづいた<sup>(101)</sup>。墓主人が帳の中に坐した形象は前・後漢から南北朝期の古墳壁画で流行し、蓮華・龍頭・流蘇（房飾り）等で帳を装飾することは十六国北朝期に盛行した。『鄴中期』に「石虎の御床は、辟方三丈。冬月は熟錦流蘇斗帳を施し、四角は純金龍頭を安き、頭は五色流蘇を銜む。帳頂上は蓮花を安き、花中は金箔を懸け、織は綻囊を成す。」とある。南北朝期の仏教石窟でも帳の四隅に龍の装飾を用いたものがみられる<sup>(102)</sup>。冬寿墓の座帳は帳頂を蓮華で装飾し、四隅を蓮華、璜、流蘇で装飾し、遼陽の上王家晋墓<sup>(103)</sup>で発見された男性墓主人の座帳ととてもよく似ている。このため、冬寿墓の墓主人が座帳内に坐す図像は、実際には遼西地区の魏晋壁画のうちのいずれかを粉本として利用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そしてさらに、墓主人の身分等にもとづいて粉本を選択し、組み合わせ、改変をおこなった状況がみられることから、冬寿墓で出現した蓮華文は当時、仏教がすでに高句麗に伝来していたことを表すのではなく、一種の装飾と文様で、粉本の重要な構成部分であるにすぎない<sup>(104)</sup>。

### 3. 三燕蓮華紋瓦当と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関係

三燕蓮華文瓦当と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関係について、各国研究者はみな、両者の間には密接な関係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が、どちらがどちらに影響を与えたかという主体と客体については見解が明確に分かれる。ひとつ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影響下に生まれたとするもので、中国の李新全<sup>(105)</sup>、王飛峰<sup>(106)</sup>、日本の桃崎祐輔<sup>(107)</sup>らを代表とする。もうひとつ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影響を受けたとするもので、韓国の姜賢淑<sup>(108)</sup>らを代表とする。本稿は三燕と高句麗の蓮華文瓦当の出現時期とその背景について分析をおこなった。すなわち、年代のうえで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出現時期は明らかに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より早く、おそらく北燕期（407～436年）に蓮華文瓦当は文字瓦当にとって代わられた。そして、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出現時期は好太王十七年

(407) 以降ではなく、高句麗滅亡まで一貫して使用された。そのため、事物発展の論理にしたがって整理すると、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と発展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三燕蓮華文瓦当は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と発展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はできる。瓦当の系譜からみると、三燕蓮華文瓦当中には幅線のある蓮華文瓦当も、幅線のないものも存在し、なおかつこの両者の変遷からみると、蓮弁の数と幅線の本数は時代が下るにつれてますます多くな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らの特徴は、国内城期の高句麗蓮華文瓦当中の有幅線蓮華文瓦当と無幅線蓮華文瓦当の発展・変化の特徴と完全に一致する。三燕と高句麗の遺物の関係からみると、高句麗墓の壁画の文様と配置、武器、馬具、甲冑などの諸要素がみな三燕文化の強烈な影響を受けており、戦争用の鉄鍬、防護装備である甲冑、馬を御するための馬具である轡と装飾用の歩揺形雲珠などの器物は、いずれも三燕の影響を受けており、さらには両者の違いを区別するのが難しいほどである。当時の人びとの往来の様子から、両者の間の往来は頻繁で、前燕期に高句麗はかつて前燕に臣服しており、なおかつ前燕期以降、冬寿や郭充などの前燕人が高句麗に逃亡している。よって、事物発展の論理的順序、瓦当の系譜、三燕と高句麗の交流などの状況からみて、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と発展はともに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影響を受けたと考える。

#### 4. おわりに

三燕の蓮華文瓦当は現在、中国東北地区で発見された最古の蓮華文瓦当である。その発生は前燕の龍城遷都（341年）後、間もなくであり、龍城の造営過程で大量に使用され、北燕期におそらく文字瓦当（「富貴萬歳」）にとって代わられた。高句麗における蓮華文瓦当は国内城地区で生み出され、まず王陵と上位階級の遺跡で使用が始まり、その出現時期は好太王十七年（407）以降ではない。注意すべきは好太王期の高句麗は実際に遼東半島をその後、支配したことによって、遼東半島南端に位置する大黒山山城でもまた、高句麗早期の蓮華文瓦当と面戸瓦が発見されており、大黒山山城の特殊な意義を示している。三燕蓮華文瓦当と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はともに仏教の伝播後、その直接的影響下に出現したもので、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発生と発展は三燕蓮華文瓦当の影響を受け、とくに三燕蓮華文瓦当のなかの無幅線蓮華文瓦当と有幅線蓮華文瓦当はその後、高句麗蓮華文瓦当の重要な型式となった。

付 記 本稿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6年度重大課題（16ZDA149）の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註

- (1) 唐・房玄齡等〔撰〕『晋書』2825～2826頁、中華書局、1974年。  
『晋書』卷107 慕容皝記：「時有りて黒龍白龍各一龍山に見れ、皝親ら群寮を率いて之を觀、龍を去ること二百余歩、太牢を以て祭る。二龍、交首嬉翔し、解角而して去る。皝、大いに悦ぶ。宮に還りて其の境内を赦し、新宮を号して和龍と曰い、龍翔仏寺を山上に立てる」。これはすなわち、345年に慕容皝が現在の遼寧省朝陽市に龍翔仏寺を建立したということで、史書は「龍見立寺」と称している。(以下、本文が用いる正史はいずれも中華書局版である。)
- (2) 劉慶柱「關於中国古代蓮華紋瓦当图案淵源考古研究」『고대 동아시아의 가와』 한국기와학회、2008年。
- (3) 戈父(編著)『古代瓦当』179頁、中国書店、1997年。
- (4) 万雄飛・白玉玉「朝陽老城北大街出土の3～6世紀蓮華紋瓦当初探」『東北亜考古学論叢』61～66頁、科学出版社、2010年。
- (5) 朝陽市北塔考古勘察隊・朝陽市北塔維修辦公室「朝陽北塔1986～1989年考古勘察紀要」『遼海文物学刊』15～23頁、1990年第2期。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北塔博物館：『朝陽北塔—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6) 辛岩・付興勝「金嶺寺魏晋建築群址為研究三燕文化提供重要線索」『中国文物報』2001年。  
辛岩・付興勝・穆啓文「遼寧北票金嶺寺魏晋建築遺址發掘報告」『遼寧考古文集』2、科学出版社、2010年。  
以下、本稿が使用する金嶺寺に関する資料はすべてこ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 (7) 焦智「鄴城瓦当分期研究」『殷都学刊』43～54頁、2007年第2期。  
そのなかの52頁 図21、22の蓮華文文様と瓦当全体の構造は金嶺寺遺跡で出土した資料と類似する点  
が一定程度あり、筆者は前燕の都が鄴城にあった時期の瓦当と考える。
- (8) 同註(6) 辛岩・付興勝・穆啓文2010年、198～224頁。
- (9) 王飛峰「三燕瓦当研究」『辺疆考古研究』第12輯、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0) 田立坤「金嶺寺建築址為“魔廟”說」『慶祝張忠培先生八十歳論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 (11) 本文図二-2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燕文物精粹』122頁の図166、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
- (12) 本文図三-1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智勤：「鄴城瓦当分期研究」『殷都学刊』43～54(52)頁の図29-1、2007年第2期。
- (13) 本文図三-2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高橋匡四郎『蘇子河流域における高句麗と後女真の遺跡』『建国大学研究員研究期報』第31図、1941  
年第2号。
- (14) 本文図三-3・4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渡辺三三・斉藤武一「満州国の撫順の古瓦に就て」『考古学雑誌』第29巻11号、667～690(670)頁、  
第2図-2・6、1939年。
- (15) 徐家國「遼寧新賓県永陵鎮漢城址調査」『考古』1049～1051頁、1989年第11期。
- (16) 李新全・蘇鵬力「遼寧新賓永陵南城址」『中国考古年鑑2008』187～188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7) 『晋書』卷6 元帝紀、151～155頁「(大興)二年(319年)、……八月、肅慎楛矢石弩を献じる。……  
十二月乙亥、大赦、百官に詔し各封事を上げ、并びに衆役を省く。鮮卑慕容廆遼東を襲い、東夷校  
尉平州刺史崔暕高句麗に奔る。三年……三月、慕容廆玉璽三紐を奉送す。……四年……十二月、慕  
容廆を以て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と為し、遼東郡公に封ず。」以上の史料から分かるの  
は、大興2年(319)に慕容廆が遼東を襲撃することに成功し、当時の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暕が高句

- 麗へ逃亡した。この時すでに、慕容鮮卑は現在の永陵南城を含む遼東地区を実際に支配しており、大興4年(321)になって最終的に、慕容廆の遼東地区占領が東晋朝廷の許可を得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 (18) 『晋書』卷109 慕容皝載記、2821～2822頁「陽裕、唐柱等をして龍城を築かしめ、宮廟を構え、柳城を改め龍城県と為す。……咸康七年、皝、都を龍城に遷す。」
- (19) 『晋書』卷109 慕容皝載記、2822頁：「皝、躬ら郡県を巡り、農桑を勸課し、龍城宮闕を起こす。」
- (20) 魏存成『高句麗考古』74頁、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  
李裕群「高句麗仏教造像考—兼論北朝仏教造像様式対高句麗的影響」『4～6世紀的中国與歐亞大陸』233頁、科学出版社、2006年。以下、「高句麗仏教造像考—兼論北朝仏教造像様式対高句麗の影響」という。  
李樂堂「仏教向高句麗伝播路線の探析」『社会科学戦線』124～126頁、2008年第11期。  
陳明華『韓国仏教美術』20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  
中国、朝鮮半島、ならびに日本の研究者もまた多くがこの観点を持つ。
- (21) 梁志龍「高句麗儒積道三教雜論」『北方文物』88～94頁、2004年第2期。
- (22) 吳焯「從向隣国的政治關係看仏教在朝鮮半島的初伝」『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 (23) 温玉成「集安長川一号壁画墓」『北方文物』32～38(70)頁、2001年第1期。  
李海濤「仏教在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伝播足迹考」『全球化下的仏教與民族』(第3屆兩岸四地仏教学術研討會)501～511頁、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
- (24) 木村宣彰(姚義田訳)「曇始與高句麗仏教」『博物館研究』38～44頁、2002年第2期。
- (25) 王飛峰「冬寿墓蓮華紋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4輯、科学出版社、2013年。
- (26) 釈恵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伝』中華書局、1992年。
- (27) 釈道世[撰]、周叔迦・蘇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956頁、中華書局、2006年。『法苑珠林校注』卷31 曇始伝「宋の偽魏の長安に曇始有り、関中人なり。出家より以後、多く異迹有り。晋孝武太元之末、経律数十部を賚り、遼東に往きて宣化し、顕授三乗、以て帰戒を立て、蓋し高句麗道を聞之の始めなり。義熙の初、復た関中に還り、三輔を開導す。」
- (28) 神清[撰]、惠宝[注]、徳珪[注解]、富世平[校注]『北山録校注』203頁、中華書局、2014年。  
『北山録校注』卷3 曇始伝：「晋の曇始、孝武末(東晋也、帝位に臨み、深く仏法を奉り、符堅の兵至り、謝玄破る也)、遼東に適き、高麗開導の始也。後に三輔に還り(三輔、咸陽県、昔秦皇此に殿觀を置く)、三輔の人、之を宗仰す。」
- (29) 撰者不詳『高僧伝』卷2 曇始伝「釈曇始、関中人なり。出家より以後、多く異迹有り。晋の孝武の太元之末、経律数十部を賚り、遼東に往きて宣化し、三乗を顕授し、以て帰戒を立てり。義熙の初、復び関中に還り、三輔を開導す。」
- (30) 本文図四、1、2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성균관대학교박물관『新羅金石拓片展』121頁、119～120頁、2008年。
- (31) 龍徳は後梁末帝朱友貞の年号で、921～923年のわずか3年のみ使用された。この碑の龍徳4年を、筆者は暫定的に924年とする。
- (32)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匯編』上、9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33) 道宣[撰]、郭紹林[点校]：『続高僧伝』993頁、中華書局、2014年。
- (34) 同註(20)、「高句麗仏教造像考—兼論北朝仏教造像様式対高句麗的影響」233頁。
- (35) 温玉成：「高句麗“相之國”」『北方文物』67(112)頁、2004年第3期。
- (36) 本文図五、1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集安出土高句麗文物集萃』101頁、科学出版社、2010年。  
以下、本書は『集安出土高句麗文物集萃』と記載する。

- (37) 小泉顕夫「平壤清岩里廢寺址（概報）」『昭和十三年度古蹟調査報告』朝鮮古蹟研究会、1940年。
- (38) 小泉顕夫「泥仏出土地元五里廢寺址の調査」『昭和十二年度古蹟調査報告』朝鮮古蹟研究会、1938年。
- (39) 本文図五、2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菊竹淳一・吉田宏志〔編〕『世界美術史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図版81、小学館、1997年。
- (40) 本文図五、3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国立中央博物館『三国時代仏教彫刻』121頁、図102、国立中央博物館、1990年。
- (41) 同註(20)、「高句麗仏教造像考—兼論北朝仏教造像様式对高句麗的影響」235頁。
- (42) 金元龍「靛島出土金銅仏坐像」『歴史教育』5、1961年。
- (4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丸都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
- (44) 田村晃一『楽浪と高句麗の考古学』同成社、2001年。
- (45) 東潮『高句麗考古学研究』吉川弘文館、1997年。
- (46) 김희찬「4세기 고구려 연화문와당의 개시연대에 대한 고찰」『韓国思想과 文化』第45集、2008年。
- (47) 백종오『고구려 기와의 성립과 왕된』주류성、2006年。
- (48) 千田剛道「瓦からみた高句麗古都集安」『青丘学術論集』第5集、1994年。
- (4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集安高句麗王陵』文物出版社、2004年。以下、『集安高句麗王陵』と記載する。  
池内宏『通溝』上、日滿文化協会、1938年。以下『通溝』と記載する。
- (50) 集安市博物館：「集安洞溝古墓群禹山墓区2112号墓」『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集安禹山M2112墓室清理簡報」『吉林集安高句麗墓葬報告書』292～299頁、科学出版社、2009年。
- (51) 耿鉄華・尹国有『高句麗瓦当』15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下『高句麗瓦当』と記載する。
- (52) 集安県文物保管所「集安県上、下龍高句麗古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年第1期。
- (5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国内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
- (5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丸都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以下『丸都山城』と記載する。
- (55) 『集安県文物志』編写組『集安県文物志』吉林省文物志編輯委員会、1984年。  
同註(51)、『高句麗瓦当』等。
- (56) 王洪峰ほか『遼源市文物志』吉林省文物志編輯委員会、1988年。
- (57) 延辺博物館『延辺文物簡編』編写組『延辺文物簡編』延辺出版社、1988年。
- (58) 渡辺三三、斉藤武一「満洲国撫順の古瓦に就て」『考古学雑誌』29巻11号、1939年。  
徐家國・孫力：「遼寧省撫順高爾山城発掘簡報」『遼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三上次男・田村晃一『北関山城：高爾山山城高句麗「新城」の調査』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93年。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撫順市博物館「遼寧省撫順市施家墓地発掘簡報」『考古』2007年第10期。  
国家文物局主編『中国文物地図集』遼寧分冊（上）、258～259頁、西安地圖出版社、2009年。以下『中国文物地図集』遼寧分冊（上）あるいは『中国文物地図集』遼寧分冊（下）と記載する。
- (59) 佟達「新賓五龍高句麗山城」『遼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
- (60) 周向永「西豊城子山山城始建年代再考」『東北史地』2009年第2期。  
周向永・許超：『鉄嶺の歴史世考古』遼海出版社、2010年。
- (61) 同註(58)、『中国文物地図集』遼寧分冊（下）、301頁。
- (62) 蘇鵬力「灯塔市燕州城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鑑』（2010）、195～196頁、文物出版社、2010年。
- (63) 同(58)、『中国文物地図集』遼寧分冊（上）、249～250頁。
- (64) 崔玉寛「鳳凰山山城調査簡報」『遼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



- 李龍彬・華玉冰・崔麗萍「遼寧丹東鳳凰山山城首次発掘取得重大收穫」『中国文物報』、2007年。
- 李龍彬・司偉偉・崔麗萍「遼寧丹東鳳凰山山城考古新收穫」『中国文物報』2008年。
- 同註(58)、『中国文物地図集』遼寧分冊(上)、255頁。
- (65) 楊永芳・楊光「岫岩境内五座高句麗山城調査簡報」『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2期。
- (66) 郭富純・趙錫金〔主編〕『大連古代文明図説』248頁、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蓋州市文物局(王飛峰ほか)「遼寧蓋州市青石嶺山城的調査與発掘」『考古』2017年第12期。
- (68) 김일성종합대학 고고학 및 민속학강좌『대성산 일대의 고구려 유적에 관한 연구』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3年。
- (69) 石光濬「高句麗考古学の新しい成果」『古代朝鮮の考古と歴史』雄山閣、2002年。
- (70) 김일성종합대학『동명왕릉과 그 부근의 고구려유적』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6年。
- (71) 崔鐘澤・李秀珍ほか『紅蓮峰第1堡壘—発掘調査総合報告書—』高麗大学校考古環境研究所、2007年。
- (72) 2016年9月7日に、嵯峨山城の発掘中に紅蓮峰第1堡壘出土瓦当文様と同じ蓮華文瓦当が発見されている。(参照) 강승형(기자)「이차산성서 고구려유물 “연화문와당” 발견」『동아일보』2016年9月8日。
- (73) 심광주・정나리・이형호『漣川瓠蘆古壘Ⅲ』(第2次発掘調査報告書)、한국토지공사토지박물관、2007年。
- (74) 王飛峰「丸都山城宮殿址研究」『考古』2014年第4期。
- (75) 関野貞「満州輯安県及び平壤附近に於ける高句麗時代の遺跡(二)」『考古學雜誌』第5巻4号、1924年。
- (76) 吉林省博物館「吉林輯安高句麗建築遺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
- (77) 方起東「集安東台子高句麗建築遺址の性質和年代」『東北考古與歴史』第1輯、文物出版社、1982年。
- (78) 姜賢淑「中国吉林省集安東台子遺蹟再考」『한국고고학보』제75집、한국고고학회、2010年。
- (79) 『三国史記』卷18 故国壤王本紀、223頁「九年(392年)、……三月、教を下して仏法を崇信し福を求めしめ、有司に命じて国社を立て宗廟を修めしむ」。『三国史記』に記載される故国壤王の年代は384~392年であるが、好太王碑によれば故国壤王の年代は、實際は384~391年である。このため筆者は、東台子遺跡の造営を故国壤王八年(391)の高句麗の国社と宗廟遺跡と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三国史記』に依拠すると故国壤王の紀年は1年多いという問題があるため、本文で故国壤王と好太王の年代を引く際にはいずれも調整している。
- (80) 王飛峰「關於千秋墓、太王陵和將軍墳的幾個問題」『辺疆考古研究』第10輯、科学出版社、2011年。
- (81) 王飛峰「吉林集安東台子遺址研究」『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 (82) 本文図六-1・2は、それぞれ註(49)の『集安高句麗王陵』図版72-1、194頁の図156を引用した。
- (83) 井上直樹「集安出土文字資料からみた高句麗の支配体制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安岳三号墳・徳興里古墳にみえる被葬者の職位の再検討と府官制」『朝鮮學報』第203輯、2007年。
- (84) 王飛峰「關於集安高句麗碑的幾個問題」『朝鮮麻線高句麗碑』文物出版社、2014年。
- (85) 王飛峰「高句麗卷雲紋瓦当研究」『高句麗與東北民族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
- (86) 同註(58)、『中国文物地図集』遼寧分冊(下)、73頁。
- (87) 本文図七-1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郭富純・趙錫金〔主編〕『大連古代文明図説』248頁、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
- (88) 本文図七-2は、同註(36)の『集安出土高句麗文物集萃』56頁より引用した。
- (89) 本文図七-3は著者撮影。

- (90) 本文図七-4は、同註(54)の『丸都山城』、図版87-2より引用した。
- (91) 本文図七-5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剛等)「集安將軍墳西南建築遺址の考古発掘」『边疆考古研究』第11輯、図版4-5、科学出版社、2010年。
- (92) 『旧唐書』、5320頁。
- (93) 『資治通鑑』卷106 晋紀28、3379~3407頁、「(太元十年(385年))六月、高句麗遼東を寇す。佐遣司馬郝景兵を將いて之を救へど、高句麗の為に敗れる所、高句麗遂に遼東、玄菟を陥とす。…(十一月)慕容農、龍城に至り、…進みて高句麗を撃ち、遼東、玄菟二郡を復す。」
- (94) 『資治通鑑』卷111 晋紀33、3562頁、「(隆安四年(400年)春正月)高句麗王安、燕に事えるに礼慢たり。二月、丙申、燕王盛、自ら兵を將い之を襲い、驃騎大將軍熙を以て前鋒と爲し、新城、南蘇二城を抜き、境を開くこと七百余里、五千余戸を徙し而して還る。」
- (95) 『資治通鑑』卷112 晋紀34、3599頁、「(元興元年(402年)五月)、高句麗宿軍を攻め、燕平州刺史慕容暉、城を棄て走る。」
- (96) 『資治通鑑』卷113 晋紀35、3633頁、「(元興三年(404年)十二月)、高句麗燕を侵す。」
- (97) 金毓黻『東北通史』233~234頁、(台湾)楽天出版社、1971年。
- (98) 『隋書』卷98 来護兒伝、1515~1516頁、「来護兒、字は崇善、江都人なり。…(大業)十年、又師を帥いて度海し、卑奢城に至る。高麗、国を挙げて来戦し、護兒、大いに之を破り、斬首千余級。」  
『資治通鑑』卷197 唐紀13、6332頁、「(貞觀十九年四月)張亮、舟師を帥いて東萊より渡海し、卑沙城を襲い、其城四面懸絶、惟西門のみ上る可し。程名振、兵を引き夜至り、副総管王文度、先ず登る。五月、己巳、之を抜く。男女八千口を獲る。」『旧唐書』卷199上高麗伝、5323頁「五月、張亮、副將程名振、沙卑城を改め、之を抜く。其の男女八千口を虜とす。」
- (99) 本文図八-1・2は、以下の文献から引用した。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남북역사학자협의외『남북공동고구려벽화고분 보존실태조사 보고서』제2권 도판、31頁、図27、국립문화재연구소、2006年。
- (100) 本文図八-3は、同註(49)の『集安高句麗王陵』図版109-5より引用した。
- (101) 盧兆蔭「略論両漢魏晋時期的帷帳」『考古』1984年第5期。
- (102) 易水(楊泓)「帳與帳構一家具談往之二」『文物』1980年第4期。
- (103) 李慶發「遼陽上王家晋代壁画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第7期。
- (104) 王飛峰「冬寿墓蓮華紋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4輯、科学出版社、2013年。
- (105) 李新全「三燕瓦当考」『遼海文物學刊』1994年第4期。
- (106) 同註(9)。  
王飛峰「高句麗瓦当研究」高麗大学校大学院博士学位論文、2013年。
- (107) 桃崎祐輔「高句麗太王陵出土瓦・馬具からみた太王陵説の評価」『海と考古学』六一書房、2005年。
- (108) 同註(78)。